



传知行学术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公民社会·转型中国

【卷首语】

主编：金复生

校对：尹书瑶

继第二期《传知行学术通讯》之后，第三期又和读者见面了。从本期起我们增设了“转型研究”栏目，不定期将最新的转型研究与大家分享；除此之外还增设了“大学论坛”栏目。中共前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先生于 2010 年 5 月 9 日逝世，我们临时为他的离去开设了“逝者”一栏，以王天成先生《纪念朱厚泽先生》一文遥寄我们的哀思。

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需要每个个体的积极参与，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交流平台，《通讯》期待着您的参与，和您一起努力，使中国社会朝着民主、自由、宪政、法治、公平的方向上发展。我们也欢迎，您给《通讯》提出宝贵的建议或批评意见。另外，本《通讯》大部分所引图片均来自于网络，在此一并向所有图片的提供者致谢。

我的电邮：chinajinfusheng@gmail.com。

2010 年 5 月 15 日

【目 录】

传知行动态 1

研究专栏 2

企业存在的理由（五）（六） 郭玉闪 2

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明确征收征用土地范围及补偿标准的建议案 楚望台 6

新农合逐渐走出两难困境 杨孚瑞 8

反对征收燃油附加费 由晨立 12

转型研究 14

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引言） 张大军 14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引言）… 张大军 21

大学论坛 27

京沪农民工子弟成长状况的调查报告 郭宇宽 27

逝者 41

“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纪念朱厚泽先生 王天成 41

副刊 44

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研究？——寄语铅笔社诸君 … 郭玉闪 44

好书推荐 由晨立 46

这二十年 何正军 48

窃国者诸侯—《我的唐朝兄弟》印象 任星辉 56

传知行推荐 59

传知行动态

刊物



传知行学术通讯 2010 年第二期

《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 第一期自上月中旬发刊以来，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和建议，在此向大家致谢。

本期《通讯》涉及近期多个热点话题，这其中有任星辉揭露计生法将国家提倡偷偷变为公民义务的《从家庭计划到国家强制的偷渡》，黄凯平展开“物业税”难题讨论的《“物业税”争议中被忽视的问题》，其他还有涉及到农村医改难题、城市土改、海外投资等多个公共话题议论的文章。

《通讯》不但是本社科类电子杂志，也是一个交流平台，我们非常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希望听到您的反馈意见，当然，也欢迎您不吝笔墨，为我们赐稿。

[《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 年第二期 PDF 版下载](#)

行动

●2010 年 1 月 26 日，传知行研究员任星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财政部信息不公开提起行政诉讼。4 月 19 日，法院向任星辉送达不予受理的裁定。4 月 21 日上午，任星辉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详情请见：

<http://sanxia2008.org/conter.asp?zid=397&one=1>;

<http://sanxia2008.org/conter.asp?zid=398&one=1>

讲座

- 2010 年 4 月 17 日，吴大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批判》，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 2010 年 4 月 20 日，秦晖《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地点：西北政法大学。
- 2010 年 4 月 21 日，郭宇宽《边缘的孩子——京沪农民工子弟成长状况的调查报告》，地点：北师大。
- 2010 年 4 月 24 日，余杰《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 2010 年 4 月 29 日，傅国涌《回望历史——百年前的大变革》，地点：华中农业大学。
- 2010 年 5 月 1 日，滕彪《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 2010 年 5 月 12 日，郭宇宽《房子那些事——如何分析和解读新闻》，地点：东南大学。
- 2010 年 5 月 15 日，王鑫海《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环境危机》，地点：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研究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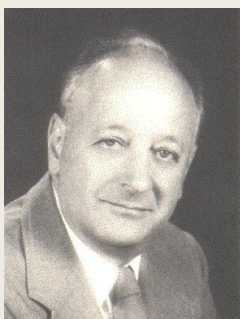
编者按：本期研究专栏我们继续连载郭玉闪研究员关于企业存在理由的系列读书笔记。国家发改委 11 月 12 日公布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政策已执行一段时间，社会各界争议四起。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营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本所负责行业管制研究的由晨立研究员明确提出了反对征收燃油附加费的意见，并从行政管制市场等各个角度剖析了该政策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不合理，所以反对。

■ 企业存在的理由（之五）：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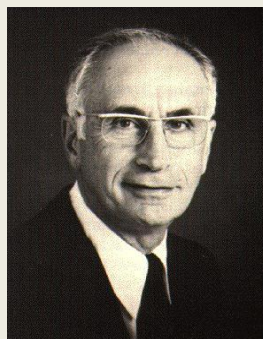
[郭玉闪](#)

参考文献：

- 1、organization of the firm, Harold Demsetz, 1992
- 2、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men A Alchian, Harold Demsetz, 1972



Harold Demsetz



Armen A Alchian

在 Alchian 和 Demsetz 1972 年论文里，他们将企业具有比市场更高生产力的原因归结到“团队协作生产”（synergistic impact of team production）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假设：团队里的人分开来单独生产的简单相加比不上团队协作生产的产出，而且这个产出也不是团队分开单独生产的线性相加。总而言之，有一种团队技术可以让这个团队合作共同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来，也使得这群人可以合作成一个“企业”那样的组织。

为什么能存在这样一种团队生产形式？Alchian 和 Demsetz 在文章里并没有仔细证明。他们只是简单的交代并假设这种团队生产形式存在。后来 Demsetz 倒是在另外一种分析框架中给出过解释，他认为，相比市场合约，企业合约的特点是（1）具有连续性（Durability），（2）存在合约规定的命令（Directability），因此，连续性使得团队成员互相熟悉各自独特能力，而因为有命令的存在，团队成员可以在不需要学会别人独特能力的情况下而共同提高团队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在专业化分工并且拥有各自不同化专业信息的各个成员之间合作可以节省学习和使用专业知识的成本并提高团队生产力。

但是，有了团队生产的可能性，还不意味着对“企业”出现的完全解释。Alchian 和 Demsetz 在论文里所定

义的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虽然有生产力高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困难,即很难(成本很高)通过观察团队的总产出就可以测量出生产的各合作方各自的边际贡献(marginal outputs of the cooperating inputs)。因此,“企业”要能出现,除了团队生产的可能外,还必须具备第二个条件:存在一种成本节约的方式,可以通过观察生产各合作方的行为就能估量出他们各自的生产贡献。



郭玉闪 Guo Yushan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提过,团队合作中每个投入方都可能会倾向于偷懒(shirking),因为偷懒带来的损失不是由他一个人承担,所以相当于偷懒变“便宜”了,于是他们总会倾向于多偷懒一点。而且在只有市场没有企业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很难仅仅通过对总产出的观察就可以正确的找出每个人的边际贡献。所以,如前所述,此时企业能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提供第二个条件,即用比市场便宜的方法衡量每个合作方的贡献从而相应的减少团队生产中因偷懒而出现的效率损失。

这个方法 Alchian 和 Demsetz 有很好的证明,就是选出一个人来专门监督其他所有生产方在团队生产中的表现。但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一个方法是通过市场的约束,即潜在的更有能力的监督者的替代威胁。可是,由于监督测量(metering)的困难,这个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让这位监督者拥有团队生产的剩余索取权。于是,监督者的努力程度也就直接反映到他的收入上了。如果他能很好的将其他团队生产合作方的收入与实际贡献匹配,那么他就能获得更高的生产剩余。相反,如果他偷懒,或者不能正确识别其他人的能力或者错误估算其他人的生产贡献,那么他将要么只获得更少的收入,要么承担团队生产带来的损失。

让监督者获得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安排其实隐含了一系列安排:监督者将可以计算总产出,衡量每个人贡献,分配产出,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以修改与任何一个合作生产方的合同甚至终止合作合同,以及在合适的时候出售剩余索取权等等。因此,在构成团队生产的所有合作合约中,这位监督者将成为中心合约方(to be the centralized party common to all contracts with inputs),也就是传统上大家所知道的企业所有者(ownership of the classical firm)。

于是,在“团队生产”和“存在一个监督者可以更便宜的降低偷懒”两个条件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在团队生产各合作方之间签订的合约结构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classical capitalist firm)已经出现了,它具有以下特点:a,联合生产,b,有一些投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c,存在一个和所有人都有合约关系的中心方,d,有权改变与某要素所有者合约内容的一方和其他要素所有者无关,e,有人拥有剩余索取权,f,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可以出售他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Alchian 和 Demsetz 特地声明,他们在论文里所处理的“企业”概念,只是在限定了团队生产(他们定义的概念)以及由这种团队生产派生出来的“衡量产出与贡献之间的高成本”而发展出来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企业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广泛,也还有因为其他形式的成本而带来的企业形式。他们还没有那样的野心要解释所有的企业产生模式:“In any event, the test of the theory advanced here is to see whether the conditions we have identified are necessary for firms to have long-run viability rather than merely births with high infant mortality。”

■ 企业存在的理由（之六）：为什么会出现各种组织形式

[郭玉闪](#)

参考文献：

1、organization of the firm, Harold Demsetz 1992

2、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men A. Alchian, Harold Demsetz 1972



Harold Demsetz (图片 from: 维基百科)

从追问企业为何会存在开始，企业理论就一直在探讨企业优于市场的生产力因素(也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企业比市场有更好的生产力，从而可以替代市场)。用 Demsetz 的归纳，也正是我前面几篇文章分别讨论的：Frank.Knight 的风险再分配 (risk redistribution)，科斯的节省交易成本(savings of transaction cost)以及 Alchian 与 Demsetz 的团队协作生产(synergistic impact of team production)等都是企业在生产力上的特别贡献。以后还会有 Williamson 的节约机会主义成本 (reduction in opportunity cost)。这些解释范式先后出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攻击和替代；不过，假如我们像 Demsetz 那样采取比较宽厚的想法，我们会承认，这些解释范式其实都构成了企业能拥有比市场更高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它们之间并不一定要你死我活比出一个高低。

但是，假如加入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生活中的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合伙制／个体／有限责任公司／公有制企业／非营利组织等）？那么以上所有这些解释范式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分。Knight 和科斯的分析，几乎完全不能用于解释企业为何有不同组织形式。而显然，Alchian 和 Demsetz 的解释显然要更为高明。

Alchian 和 Demsetz 在 1972 年的论文里，用团队生产中计量每个人边际生产贡献与回报之间关系的困难，发展出让监督者监督其他生产者，同时监督者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模型解释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结构；借助同样的思路，他分析了利润分享企业（profit-sharing firms）、社会主义企业（socialist firms）、公司（corporation）、互助型企业与非营利性企业（mutual and Nonprofit Firms）、合伙制（partnership）、工会（Employee Unions）等。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成本的存在，偷懒总不可避免，所以需要监督者，但是由于团队关系的复杂，未必所有的利润或者企业剩余都要被唯一一个监督者获得。

比如利润分享与合伙制就对应着一类情况。如果团队合作的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或者从事其他智力活动的，那么即使存在一个唯一的监督者，要发现别人是否偷懒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靠观察他们的动作是判断不了他们是否在偷懒的。但是，如果这群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确实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而管理他们的成本又极高，那么比较合适的方式就是用类似合伙制的方式让这些人一起来分享企业剩余。此时，每个人都得自我管理（self-policing）。Alchian 和 Demsetz 指出，在小团队中，或者彼此互相熟识的人群中（也就是彼此知道对方的行为模式，知道对方会怎么偷懒），即使每个人都没有获得完全的不偷懒的激励，这样一个合伙制或利润分享的合作方式依然是可以存在的。

企业是另外一种情况；企业生产需要资源投入，而所需资本巨大时用股份方式来融资相对比较便宜，但与利润分享或合伙制相比，分享企业剩余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带来的管理者偷懒问题（shirking problem）也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股东人数太多，在监督管理上偷懒的诱惑就很大（偷懒的成本由所有股东一起承担）。所以，此时合理的治理结构应该是：首先，股东是有限责任，其次，股东会聘用一个管理层来做管理，再次，对管理层的监督依靠来自企业内外的竞争。企业外的竞争来自市场上其他管理人员，企业内的竞争来自于股东的投票。想控制管理层的部分股东可以联合起来获得足够的决定权，以决定自己的代理人人选。

除了对企业、利润分享与合伙制的解释，Alchian 与 Demsetz 同时认为，互助型与非营利性的企业因为管理层没能分享管理带来的企业剩余，所以他们偷懒的程度一定会比前述三种企业形式要来的大。另外，用同样的监督与偷懒模式，Alchian 与 Demsetz 也同时分析了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的内在逻辑。

Shirking Problem 以及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企业剩余索取权等等，Alchian 与 Demsetz 1972 年的这篇论文给经济学增加了这么多新内容，难怪是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

■ 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明确征收征用土地范围及补偿标准的建议案

[楚望台](#)

编者按：这是一份提案，今年3月两会期间为了在立法层面推动拆迁及土地制度上的改革，由本所研究员楚望台执笔，数名人大代表联名向两会提交了此提案。在中国，离消灭野蛮强制拆迁依然任重道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按照立法理念，《宪法》既已确定了对土地征收征用的一般原则，作为下位法的《土地管理法》，应当依照宪法原则，对本条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土地管理法》仅是照搬照抄了《宪法》原文，并未定义“公共利益”的范围、除耕地外未规定其他土地征收征用的程序、未规定给予补偿的标准。该法未对宪法原则作出具体、可操作的延展。



楚望台 Chu Wangtai

近年来，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事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立法层级过低、立法概念不明有关。需要明确的是，从概念上应将拆迁与强制拆迁分开。拆迁是开发商与土地权利人之间通过协商、购买土地权利并拆除地上附着物用于其他建设的民事行为，以平等自愿为原则，应受民法的调整。而强制拆迁是政府为公共利益、在业主非自愿的情况下征收、征用土地权利用于公共建设的行政行为，应受行政法调整。拆迁问题的实质，在于征收、征用。

国务院于一九九一年通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混淆了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的界限。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拆迁中出现的民事争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第十五条规定了对民事争议中拒绝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该条例以行政权力强硬介入民事关系，且强烈偏向于拆迁人一方，违反了民法公平自愿的基本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

该条例引发的现象是，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将本应由自愿协商的购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民事交易，一概纳入行政征收征用的范围。在未经与产权人协商的前提下，以不合理的补偿价格进行征收、征用，并颁发拆迁许可证，并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拆迁，再将低价征收征用的地块进行转让，从中牟利。

土地及房屋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保证其产权的正常有序流转，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

土地及房屋产权流转制度，属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依《立法法》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故，我们提出以下的立法原则：

第一，对于受民法调整的拆迁，即民事关系中的购买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行政权力应当从中退出，还原民事关系的平等、自愿精神。对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不得强买。

第二，对于受行政法调整的征收及拆迁，即行政征收及行政强制拆迁，均属羁束行政行为，应以法律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土地征收征用的程序、给予补偿的标准。

据此提出本案，建议在《土地管理法》第二章“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下新设第三章“土地的征收与征用”，并加入以下条款，请大会审议：

第三章 土地的征收与征用

第十七条 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公共利益用地包括：

- （一）军事、国防、抢险救灾、防疫建设用地；
- （二）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矿、铁路、机场、码头、桥梁及附属设施用地；
- （三）公共设施用地，如水、电、油、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 （四）教学、科研及福利事业用地。

第十八条 公益性项目建设征收、征用土地，已获得批准的，不得改变项目原有规划进行建设。原有规划无法实施的，原土地权利人可按原补偿价格回购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第十九条 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应不低于原土地权利人转让土地权利的可得收益。

第二十条 征收、征用土地获得批准的，被征收、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用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征收、征用土地决定及补偿、安置方案送达土地权利人。

第二十一条 土地权利人对征收、征用土地决定及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可以自接到征收、征用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停止征收土地的实施。

■ 新农合逐渐走出两难境地

[杨孚瑞](#)

作者按：08 年新农合刚在全国推广的时候，筹资水平较低，农民所得实惠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有限的资金无论用在哪里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有些研究者质疑新农合是否会陷入许多两难选择中找不到出路。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筹资水平明显提高（大部分地区提高了 50%），各地的操作实践也日渐成熟。有些两难选择已经不存在，有些有所减轻，有些依然存在。本文目的在于向关心新农合的朋友介绍新农合的最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农合的前景。

为解决农民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2002 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 年开始试点，2006 年开始向全国推行。截至 2010 年初，全国已有 8.33 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参合率达到 94%。2008 年 7 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了潘林撰写的《新农合的九个两难选择》，该文典型的反应了在新农合推行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到 2009 年初，又过去了一年半，新农合的发展是否仍然面临这些困境，其发展前景如何呢？笔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和阅读在此以一些研究心得，与所有关心农民医疗健康的朋友分享。

➤ 自愿参加还是强制推行？

这个难题基本解决。在 2006 年刚开始在全国推行时，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对新农合不理解，认为白白多交 10 元钱是不划算的。甚至个别地方为了提高参合率由政府代替农民缴纳参合基金。但是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和报销力度的增强，农民认识到了医疗保险的好处，所以现在参合农民都是自愿参加。笔者调查的河北大名县、陕西佳县都是国家贫困县，群众虽然也有对新农合不满意的地方但普遍认为有新农合肯定比没有之前好，都是自愿参加。



杨孚瑞 Yang Furui

关于参合的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新农合普遍以户为单位参加，而不是以个人为参加单位，所以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减弱。农业税停止征收后，每人 20 或 30 元的参合费对农民构不成明显负担，而且即便是青年人也可能会看病，所以逆向选择的效应趋于消失。

➤ 直接收缴还是代扣代缴

这个两难选择也不再存在。2006 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各项杂费很难再像先前那样摊派。把其他款项挪用其实也没有必要。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农民看到了参加新农合的好处，缴费仅仅是个手续问题，所以政府官员再冒违反政策的风险代扣代缴就不必要了。

➤ 保大放小还是保小放大

这个两难困境其实还存在。不过用两难选择不恰当。困境存在是因为目前的筹资水平（2010 年全国大部分地

区是人均 150 元) 还不足以小大病都保, 甚至光保大病都明显不够。但这里并不存在两难选择, 因为新农合在筹划时就确立了“大病统筹”的原则, 所以各地基本都是“保大放小”。对于小病的医疗福利, 各地不太相同, 虽然有一些, 但都没有采取“保小放大”。

关于保大病, 其实, 目前还不到位。除了个别县, 一般的农业地区县内报销住院费的比例大概是 70% 左右, 而县外大医院报销的比例大约 40%。农民有了大病还是要到县外大医院看, 仍然要负担一多半。而且, 各地新农合都有封顶线, 也就是报销的最高限额。今年陕西是 3 万元, 河北是 5 万元。这些都说明新农合只能对大病有较明显的补偿作用, 但还不能完全防止农民因病致贫。

➤ 设立家庭账户还是取消家庭账户

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根据中央文件, 从 2010 年起, 家庭账户应该逐步取消。因为家庭账户存在较大的管理成本, 而起的作用很小。2009 年河北大名县的家庭账户允许一年人均报销门诊药费 10 元, 而一次门诊费用就可能上百。家庭账户可以说对于解脱看病负担没有实质意义。2010 年起, 该县已经把门诊报销纳入统筹基金, 取消了家庭账户。

家庭账户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克服农民怕吃亏的思想从而提高参合率。当医疗保障高到一定程度后, 绝大部分农民自愿加入, 不再需要家庭账户的形式。

➤ 定点就医还是自主选择

这个两难选择还是存在的, 而且原文指出定点医疗机构和非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平等竞争依然如此。这也确实是个两难选择。因为不定点就无法监督医疗机构, 定点就必然产生不公平竞争。现实中做的比较好的县, 例如陕西神木, 它有 7 个县级定点医院, 但只有一个是公立医院。这样的话, 只要达到一定资质都可以平等参与竞争。但是对于乡镇卫生院各地基本都是独家垄断定点资格, 没有私人小医院或诊所与之竞争。

将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只要合乎考核标准, 都应该给予定点资格, 以此来防止公立医院的垄断。

➤ 重速度还是重质量

这个两难困境一开始存在, 但目前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由于新农合是政府力推的项目, 所以推广速度很快。而农民对于一个新鲜事物总有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农民刚刚度过乱收费的年代, 对于新的缴费, 无论干什么都持有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县的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而强行推进, 自然质量不高。但是随着筹资水平的迅速提高 (从试点时的 50 元提高到 2008 普及时的 100 元, 再到 2010 年的 150 元), 同时个人缴费只占 20%, 报销力度在逐渐加大, 农民看到了参会的好处, 积极性自然增加。

2010 年初参会率达到 94%, 已经不是政府在作秀, 而是农民自愿参与的结果。参会率到了接近 100% 的时候, 自然不会再有速度可供追求了。以后的问题就是提高质量, 也就是说给予看病农民更大比例的报销, 彻底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政府承诺说再过两年, 新农合筹资水平将达到人均 300 元。我们希望那时能基本达到人人享

有医疗保健这个目标。

➤ 裁判员还是运动员

这个两难困境虽然也还存在，但是，在新农合问题上，远没有评论人士认为的那么严重。通常来讲，“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指的是政府的卫生部门，或新农合管理机构。之所以说这个困境还存在，是因为卫生部门要对主管医疗机构的生存负责，而不是制定好规则后，任凭各个医疗机构平等竞争。这在乡镇卫生院尤其表现的明显。由于政府在财力、物力、政策上的支持，乡镇卫生院具有远比私营同级医院高得多的优势。

对于县级和更高的医疗机构，卫生部门充当运动员的性质要弱一些。目前各县基本都有一所归县卫生局直属的县医院。政府对于县医院有一定投资，比如基建、工资、或者人才引进等等。不过县级医院的生存主要靠市场竞争。

例如对于卫生院，各省基本都有明确的支持政策。但是对于县医院并不明确。对县医院的投资要看县财政状况。这是因为要建立一个医疗保障网，越是基层越是政府保障的主要目标。

但是由于医院是非营利机构，所以政府部门并不能从医院盈利中获益。无论是笔者调查的河北大名县还是山西神木县和佳县，都是如此。而且即便是乡镇卫生院的收入也都完全留用没有上缴。

这就和政府部门办企业有巨大的不同。因为政府办的企业盈利与否跟举办部门利益极度相关，所以可以说政府部门办企业如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医院并不和卫生部存在这种利益关联。给公立医院拨款也是财政的事，跟卫生部门自身的行政费用没有关系。所以无论卫生局还是合疗办，它们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政绩上，而不是公立医院是否盈利上。因此，卫生局与合疗办基本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的角色，只不过这个裁判员有些偏心。

➤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运作

这个两难虽然还存在，但并不是难以两全的坏事，而是多出一个选择机会的好事。目前的政府主导模式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关键是政府投入占大头，而且是中央政府投入占最大（40%）。今后政府财政收入提高，新农合筹资水平也会水涨船高，农民得到的看病实惠只会越来越多。

但是目前政府主导这条路走的通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更好的路可走。学者们建议的走市场化的道路，交由专业的保险公司去运作新农合资金也许效率更高，也就是说同样的钱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

引入保险公司的的好处主要是保险公司有更专业的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种制定更切实的报销标准。并且对于医疗机构的建设也更到位。

不过，引入保险公司并不是只有好处。首先，增加保险公司这个环节是有成本的。保险公司由于利益驱动虽然会有监督医疗机构适度医疗的激励，但同时，保险公司也有从政府基金那里获取更大份额利润的激励。其次，中国的保险业不发达，如果让农民自发寻找保险公司会给农民带来新的不方便，而且也容易出现垄断。再次，商

业公司的介入容易造成新的腐败。而且中国的保险公司基本都是公立，其效率和廉洁与发达的市场国家没法比。

引入保险公司最大的障碍其实还是政府的保守特性。因为现在政府主导已经可以做到让大部分人满意了，所以政府通常不会冒险尝试一种也许更好的方法。

➤ 合作医疗制度还是社会医疗保险

这个两难虽然目前还是两难，但已经不是让人头疼的实质问题，只是个名称问题。但这也确实牵涉到新农合的发展方向。

新农合因为其资金 80% 来自政府，而且目前中央政府补助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区和县级市，所以可以说新农合是针对全体农民的一项社会医疗保险。

当新农合制度巩固以后，转化为完全的社会保险是很简单的事，只需把自愿参加改为强制参加，并对特困人群实行专门救济。如果更像样一点，就应该引进保险公司，把政府办医保变成保险公司办医保，而政府负责埋单。

经济的发展注定要完善全民的医疗福利并取消各种人群的福利歧视。个别经济发达的县已经做出了较好的榜样。陕西省神木县把全县的干部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都统一为神木免费医疗制度。农民不但享有基本免费的医疗福利，而且和市民、干部享受同一水平的医疗待遇。

新农合的未来必定是要并入全民平等医疗福利体系当中。

■ 反对征收燃油附加费

[由晨立](#)

近来，油价持续上涨，于是各地出租车管理部门又在酝酿加收燃油附加费，以此弥补油价上涨提升的行业成本。是的，无论是油补还是燃油附加费，都能够有效地避免油价上涨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损失。然而，无论如何，油价都是要涨的，这个成本总要有谁来付。现在行业经营者不付，就自然是由公共财政（油补）或是出租车消费者（燃油附加）来付了。这种成本转嫁是否合理？我认为不合理，所以我反对。

从来没有听说一个自由竞争的行业向社会伸手要求补贴的。不能因为菜价、米价、食用油价格上涨，餐饮业就要求加收炒菜、蒸米、熬粥附加费。不能因为棉花涨价，制衣业就加收布料附加费。也不能因为原材料涨价，家电、IT 产业就加收材料使用附加费。一个自由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是行业内部不断竞争的结果。竞争的过程就是不断压低成本、增加利润，不断的优胜劣汰。当成本上升时，哪家企业能够最大限度的消化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它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或者获取利润。竞争市场的规则是适者生存，因为成本上涨就索取高价，必将被竞争淘汰。



由晨立 You Chenli

再者，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价格不是根据成本定的，而是根据需求定的。因此，如果社会需要，即使成本很低，价格也可能很高。但是如果社会不需要，就算成本惊人，却往往无人问津、血本无归。价格是市场定的，不是生产者定的。成本高永远不能成为要价高的理由。就像两个工人织布，一个人生产一块布只要 1 天，另一个人产出同样的一块布则要 2 天。如果第一个人要价 10 元，第二个人当然不能因为时间成本高而要价 20 元。如果这样的话，干脆大家一起依靠磨洋工，争当百万富翁吧。

当然，价格上涨也经常发生在自由竞争行业，但那是产品需求上涨以及行业内部不断竞争的结果，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可以做到的。而恰恰因为出租车行业属于行政管制行业，因此得以轻而易举的发放油补和加收燃油附加费。实际上，数量管制政策已经为出租车行业创造了巨额的利润空间。根据各地调研掌握的数据，出租车的行业利润率（除去按当地平均工资计算的人力成本），可以达到 40% 到 50%。这样的利润率对于很多行业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而这种利润水平也足够消化油价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

但是，出租车行业内部还存在着利润分配和成本负担的问题。如果说数量管制把垄断利润赋予了出租车经营权所有者，那么一线驾驶员作为行业服务的实际创造者却难以从中获益。无论是在公司制下，还是在个体制下，垄断利润都由经营权所有者（公司和车主）获取。但是对于一线驾驶员而言，他们的劳动收入除了支付份钱和油钱，剩下的才是自己获得的劳动工资。由于两种制度下，经营权所有者都能够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份钱以最大限度的获取垄断利润，因此驾驶员能够获取的收入，也基本上只相当或稍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同时，由于加油都是由驾驶员负责，因此油价的上涨也基本上为驾驶员所承担。

所以，当行业的高额利润由经营权所有者享受，而成本上涨由一线驾驶员承担的时候，成本的上升就难以在行业内部消化了。经营权所有者不愿意自己享有的利润受到些许的损失，而驾驶员本就不高的劳动收入又因为油价上涨而被压缩，于是驾驶员只能诉诸行政力量解决自身面临的成本困境。出租车作为数量管制下的小行业，其

驾驶员群体形成谈判力量的交易成本就较低，再加上经营者群体的默许甚至鼓励，就形成了强大的谈判力。行业管理者在难以对既得利益者进行利润再分配的前提下，只得通过行政手段，向缺少谈判力的公众或是出租车服务的消费者伸手要钱了。

故而，需要请大家看清楚。一个行业本就不应当因为成本上升而漫天要价，要求公众或消费者为成本买单。而作为一个赚取高利润的行业，更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承担它本应该、而且也能够消化的成本上升压力。如果一线驾驶员面临成本压力，他们能够指向的唯一矛头，应当是享有利润的经营权所有者，力争实现利润的再分配，而不是已经为出租车行业付出巨大代价的公共财政和消费者。

退一万步讲，即使希望公共财政和消费者负担本不应该承担的代价，是不是应该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谈判程序，让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使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站在对等的位置上讨论问题，而不是让公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代表”？

再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达成了“油价上涨——价格上涨”的最终协议，那么是否更应该创立一个“油价降——价格降”的真正意义上的价格联动机制？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油价始终在上下浮动，但出租车价格却一直走在持续上升的单行线上。“油价可以降、但租价必须涨”成了出租车价格的硬道理。所以，如果要求我们为今天的油价上涨买单，那么明天油价一旦下降，则决不能剥夺我们享受低价的权益。

是的，今天的出租车价格持续在高位运行而依然业务繁忙、利润不菲。这种繁荣背后，是行业管制政策对消费者剩余的持续剥夺和对行业整体经营效益的极大损害。美好幻想的背后是巨大的代价。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早就说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代价是今天出租车数量有限、价格高昂，公众享受出租车服务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看不见的呢？谁也不知道出租车行业的低效经营对私家车高速增长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还要继续提价吗？请当心中国公路交通所能承载的负荷量。



2010年5月5日

转型研究



张大军 Zhang Dajun

编者按：张大军先生是本所的理事，研究员。主持传知行研究所的中国转型研究，包括转型专题研究报告，转型译丛等，目前已翻译了《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等介绍转型理论的专著。本期我们专门开设了“转型研究”一栏，刊登了张大军最近翻译的两本转型译著《A Force More Powerful—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unarmed Insurrections—The People Power Movement in Nondemocracies》（《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的引言，以后我们也将不定期的刊载此类转型相关研究文章。

■ 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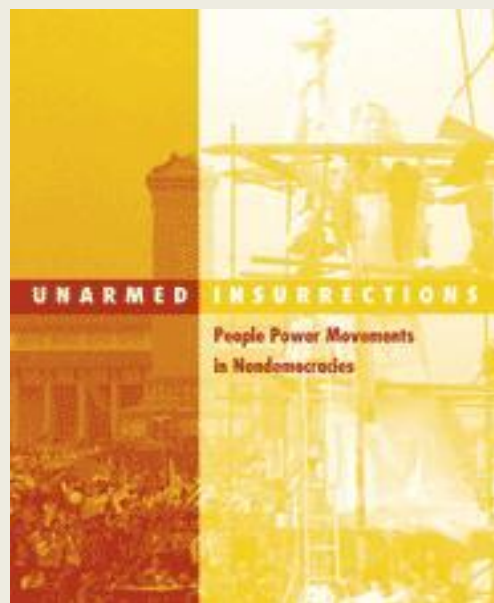
著：Kurt Schock

译：张大军

非暴力是一种悖论。尽管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作为一种对抗压迫的办法的潜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拿撒勒人耶稣、莫罕达斯·甘地以及小马丁·路德·金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政治竞争的特色却一直都是武装叛乱、恐怖主义和内战，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另外，非暴力行动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矛盾的东西。非暴力行动的推崇者宣称，它是治疗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批评者则说，它对于在受压制的环境中推动变革是一种无效的战略，暴力是力量的终极形式，或者结构性关系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方向和速度。非暴力行动一定不要被浪漫化，不过它也不应被低估。在本书中，我提到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挑战压制和非正义的方法的潜力，并根据经验事实考察“正面的”案例和“负面的”案例—在前者，它推动了政治变革，而在后者，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斗争受到压制。我没有聚焦于非暴力行动的道义力量，而是将非暴力行动看作“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活动”并集中关注其实际能量。在这样做时，我希望有助于对非暴力行动的更为精微且更加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解。

在二十世纪末——该世纪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一股非武装反抗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大规模抗议示威、罢工、抵制、公民不服从以及其他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就此被用于推进“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转型。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激起了民众的想象力，并激励了全世界对抗压迫的挑战者的斗争。不过，与这些欢喜快乐的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尔、巴勒斯坦、巴基斯坦、西藏、东帝汶、缅甸、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非武装反抗受到残酷的镇压。对非武装反抗的不同结果做出解释是否可能？虽然对个别斗争的案例研究有很多，缺少的却是对下一问题明确的比较和分析式考察：非暴力的斗争方法在有些非民主的环境下是如何促进政治转型的，而在另一些环境下却又没有做到？通过考察发生于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六场非武装反抗：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1983-90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1983-86年）、以及缅甸（1988年）、中国（1989年）、尼泊尔（1990年）和泰国（1991-92年）的民主运动，我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我遵循 stephen zunes 的看法，将非武装反抗定义为对政府权威的有组织的群体性挑战，而这些挑战主要依靠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武装手段（Zunes, 1994 年）。¹ 就它们是以民众为基础并且通过普遍的民众参与来实现这一点而言，它们是“群体性的”。这就是说，民众非但没有被置于一为武装先锋提供支持的地位，而是斗争中的主要角色。因此，人民力量这一用语常常被用来描述这些斗争。它们是“非暴力的”，因为它们对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挑战主要是通过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通过暴力的手段。当然，非武装反抗几乎总是会遇到当权者的暴力。这是预料中的事。确实，非武装反抗很少是完全非暴力的，因为骚乱、纵火以及谋杀对手或者与政府合作者的事可能会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不过，正如 zunes 所指出的那样，当非武装反抗中真的出现暴力时，这通常是那些不遵从反对运动领导人的边缘势力的举动或者密探的怂恿行动的结果，而且这些人士所采用的暴力通常采取的形式是，以诸如石头或者燃烧瓶之类的非致命武器对抗国家暴力（Zunes, 1994 年）。² 非武装反抗是 ralph summy 所指称的“没有被理想化的非暴力行动”的范例。他说：“一个有着非理想化形态的非暴力运动可能发展成其他的政治样式。尽管依然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它可能会包含传统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而且甚至也许会陷入暴力的境地”（Summy, 1993 年，16 页）。³ 因此，像政治竞争中的很多情节那样，非武装反抗可能是违法的，不过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采取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民众，而非来自从事武装反叛的军事人员或者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投掷石头的年轻人。



书名：《unarmed Insurrections –The People Power Movement in Nondemocracies》

作者：Kurt Schock

另外，非武装反抗通常所蕴含的非暴力是功利性的，而非原则性的。功利性非暴力的特点是，因意识到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有效性而认同它们，认为手段和目的能够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不可调和的利益的争夺，试图在斗争的过程中向对手施加无形的压力以削弱对手的力量，以及并不把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反，原则性非暴力的特征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而认可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认为手段和目的不能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与对手共同面临的问题，承担斗争过程中的苦难以改变对手的观点，以及从整体上将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Burrowes, 1996 年，98-101 页）。⁴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非暴力行动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非暴力。本项研究的焦点是前者；也就是说，关注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

本书所考察的六个案例都称得上“非武装反抗”，和“非理想化”与“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在出现政治转型的案例中，能够并且已经提出的观点是，非暴力行动的力量-而非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力量-最直接地导致了政治变革。当然，在上述六个案例中，在非暴力抗争的同时出现了暴力，这一点在南非最突出，在菲律宾和缅甸有点苗头-边缘性游击战与非武装反抗同时出现在那里，在中国、尼泊尔和泰国孤立的事例。不过，就像将非暴力理想化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一样，下述做法对社会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将他们对非暴力行动的分析只局限于那些稀少的完全是非暴力性质的抗争，或者在发生暴力的抗争中忽视或不提及非暴力行

动的力量。非暴力行动的发生机制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而且应该考察的是它何时以及在哪里发生。当考察非武装反抗的动态时，在落实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之外可能会发生的暴力是应该审视的许多变量之一。

我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希望贡献一种运动导向的研究民主化的方法。尽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都完全属于“第三波”民主化的范畴（亨廷顿，1991年；markoff，1996年），由于它历来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先决条件或者发生于民主转型前夕的精英间的谈判，关于民主化的研究却是成问题的。对于理解几乎总是在民主化之前出现的大规模政治竞争过程，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鸿沟。通过更多地以运动为导向对政治变革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得到矫正。

本研究更为核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有助于更多地将政治过程之方法应用于解释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竞争中，而且我希望证明，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受益于对有关非暴力行动之文献的认真研究的。我相信，下述说法在今日的真确性就像几十年前它第一次被宣示时一样：“将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也即关于非暴力行动和政治抗议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会大大地增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Lipsitz 和 Kritzer，1975年，729页）。5 单个理论视角的长处弥补了另一个理论的短处。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但在解释其轨迹和结果方面则没有这么有力。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确定那些有利于或者限制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的方方面面，但在确定有助于重新塑造政治环境的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却没有这么有力。另一方面，有关非暴力行动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运动的轨迹，而非其源起，并且强调代理机构（尤其是战略）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我希望说明的是，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处理政治过程之方法没有加以充分阐释的某些方面的，以及明智地使用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能够为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带来有益的洞见的。

从方法论上来讲，社会运动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根据运动或者地区专家划分的案例研究。尽管毫无疑问是必要且有益的—如果没有这种文献系统，本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单一的案例研究却较不适合于发现在不同的抗争情景下反复出现的规律、机理和态势。在承认所有国家都是其自身历史与环境之独特产物的同时，我也承认，它们的独特性并不会妨碍恰当的比较，而且跨国比较可能会发现那些在整体性的案例研究中可能不会出现的洞见。因此，我所依托的这一方法论试图找到类似的机理和态势，而这些机理和态势出现于不同的抗争案例中，并且由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先后顺序或者两者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运动轨迹和结果（Meadam, tarrow 和 tilly, 2001年；tilly, 1995b, 1997年，2001年）。我希望，这一方法论的好处超过其缺陷。寻找详细的描述、新的一手数据或者对每一抗争故事之整体历史解释的运动或地区专家肯定会对本研究感到失望。同样，下述进行宏观比较的理论家们也会失望：他们寻找从所有非武装反抗的案例中像密尔那样分离出来的某一特定结果的“必要充分”条件。毫不惭愧地说，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会这样做。

本项研究的适当目标是，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非武装反抗在各国的不同轨迹提供一些说明。我不是试图对这六个抗争故事做定论性的描述，或者构建出一种有关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一般理论，而只是想画出一种可能对研究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学者有用的框架。我试图通过下述方法做到这一点：评估所考察的每一场抗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有关非暴力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文献所阐明的那些特征和行动，而这些特征和行动在压迫性的环境中应该会提高它们保持韧性的能力，并且会增加它们相对于其敌手的影响力。我还试图说明，运动的特点和政治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非武装反抗的轨迹的。鉴于对非武装反抗之比较分析的缺乏，我将本书视为一种解释框架的首个版本。我希望本书至少能够激起争端，以推动其他人进行有关非暴力行动和非武装反抗之态势的比较研究—通过详细阐述或者批评我的结论。

非民主环境下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的作用的比较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三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著作已经出版：由 stephen zunes、lester kurtz 和 sarah beth asher 主编（1999 年）的*非暴力社会运动：一种区域性视角*，彼得 ackerman 和 jack duvall 所著（2000 年）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力量：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暴力冲突*，以及 peter ackerman 和克里斯托弗 kruegler 所著（1994 年）的*战略性的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动能*。zunes、kurtz 和 asher 主编的那本书研究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全球大量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包括巴西的反抗军事独裁体制的非暴力抗议，东欧和苏联的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缅甸和泰国的民主运动，尼日利亚奥干尼族人争取人权的抗争，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尽管他们的研究揭示了非暴力行动在二十世纪末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有标杆意义的抗争方法，该书却缺少一种前后一贯的分析架构。某些主题反复出现于许多章节之中，比如压迫的两难性、非暴力约束的有效性、第三方的角色、以及非暴力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不过，一种依托这些主题的分析框架却没有构建出来，以解释不同运动的轨迹或者结果。

ackerman 和 duvall 的研究也考察了许多采用非暴力行动的抗争活动，描述了从 1905 年的俄罗斯到 1990 年代的缅甸和南斯拉夫的整个二十世纪非武装反抗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记录全球对非暴力行动日益增多的应用以及非暴力行动在反抗压迫和非正义的斗争中的能量，它也是有益的，可是，在解释不同抗争的轨迹和结果时，它缺乏明晰的分析框架。

ackerman 和 kruegler 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因为它建构出一种明确的分析架构，以解释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抗争的轨迹和结果。ackerman 和 kruegler 明确了十二个“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原则”，并评估了这些原则在整个二十世纪期间的六场不同的非暴力运动中落实的程度，包括欧洲的四场运动（1904 到 1906 年间的首次俄罗斯革命、1923 年德国人反对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的抗争、1940 到 1945 年间丹麦人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以及 1980 和 1981 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南亚的一场运动（1930 到 1931 年的印度全国解放运动），以及中美洲的一场运动（1944 年萨尔瓦多的公民罢工运动）。他们得出结论说，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之原则的实施提高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在提供一种其他著作所无的分析架构的同时，ackerman 和 kruegler 却没有充分地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相关文献，并且对抗争之政治环境的理论化程度不足。另外，他们的案例包括反对外国占领的非武装反抗以及反对其自己政府的民众抗争—这些冲突可能蕴含着不同的逻辑。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并从两个方面丰富了正在增多的非暴力行动比较研究文献。首先，我提出一种分析框架，以说明非武装反抗的轨迹，而我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直接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并找出跨越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理论方法的结合点。其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在时间和国际背景上有着更多的限制。zunes、kurtz 和 asher 的那本书揭示出二十世纪晚期全球非暴力行动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中的深入程度，这一点是有益的。ackerman 和 duvall 以及 ackerman 和 kruegler 的研究揭示出，基本上属于非暴力性质的抗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中反复出现，可是，为了分析的目的，更加有益的是考察一组被时间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案例。

研究亚洲的专家可能对我将一个非洲案例包括进亚洲案例之中的做法感到不可理喻，而研究南非的专家可能对我将南非的案例纳入亚洲案例之中同样感到困惑，我却发现，超越区域研究所设定的分界线的比较是引人入胜的。我考察的案例有：1980 年代中期前后的两个第三波民主化中非武装反抗的案例（南非和菲律宾），1980 年代晚期的两个案例（缅甸和中国），以及 1990 年代初期的两个案例（尼泊尔和泰国）。另外，这六个案例在它们的组

织、策略、政体类型以及运动结果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组织状况各不相同：从缅甸相对自发的运动到尼泊尔预先规划和高度协调的运动。它们的策略也不同：中国的策略主要是抗议和劝说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南非的策略涵盖一系列非暴力行动手段-其重点是不合作以及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并且还包括一个以颠覆活动支持非武装反抗的武装派别。就政体类型而言，发生这六场故事的政权是：南非的具有种族排他性的寡头政权、菲律宾的个人独裁政权、缅甸的军人政权、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政权、尼泊尔的国王政权、以及泰国的立宪君主政权/“半民主政权”。⁶就结果来说，人民力量运动推动了南非、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的民主化，同时在缅甸和中国却受到镇压，没能推动民主化。至于这六个案例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权下的非武装反抗的人群所具有的代表性，笔者没有给出相应的说法。不过，鉴于它们在组织、所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政体类型以及结果方面的差异性，根据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普适性，从而超越手头上的这六个案例。

在第一章中，我对非暴力行动加以定义，并将之与其他回应压迫和非正义的战略选择进行比较，比如退出、日常的抵抗形式、建制性的政治行动以及暴力抵抗。妨碍对非暴力行动动力机制之准确理解的一个因素是，非暴力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误解。我在开始的那一章试图驳斥民众和专家对非暴力行动的一些非常大的误解，包括这样的想法：非暴力行动是“被动的抵抗”；非暴力行动涵盖所有非暴力的做法；非暴力行动是建制性政治的一种形式；非暴力行动是谈判或妥协的形式；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行动以道义压力为基础并且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受苦转变对手的观点；如果国家以暴力回应，非暴力行动就失败了，而且非暴力活动可能因为它导致活动人士的牺牲而被摒弃；非暴力行动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没有暴力手段的情况下才使用；非暴力行动是中产阶级的手段，对其的应用限制于追求温和或者改革式的目标；非暴力行动在带来政治变革方面天生地就是和缓的；非暴力行动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或者针对“民主政体”或“仁慈的”压迫者时才是有效的，而且唯一决定非暴力抗争之结果的是压迫者的看法或者压迫者以暴力镇压做出回应的能力和意愿。

在第一章中，我也简单地讨论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政治竞争方面的普遍趋势。我提出，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的合流导致二十世纪晚期全世界非武装反抗成功案例的大幅上升以及武装游击反叛成功案例的下降。结构性进展-指国家建构和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对暴力技术的垄断升级-在许多地方导致力量的平衡从有利于武装反叛转向有利于国家力量。与此同时，通讯技术的进步扩大了观念跨越国界的流动，有助于对国家活动的监督，并让国家更加难于对其公民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这些结构性转变同时发生的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规范性关切日益增加，以及活动人士对暴力抵抗的有效性后果的保留态度日益增强。上述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导致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全球性且具有示范意义的抗争形式在二十世纪晚期获得发展。我没有假定这些进展是线性的，而只是坚称，许多因素在二十世纪晚期形成合力，推动了非民主政体下的非武装反抗。

尽管有第一章所确认的全球性非武装反抗的浪潮，社会学家对它们的动力机制了解得很少。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对解释非武装反抗之轨迹和结果可能有用的两种理论方法：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为了让非武装反抗能够推动非民主政权下的政治变革，它们必须在面临镇压时保持韧性，削弱国家的权力，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获得第三方的支持。依托于有关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我详细列明了非暴力抗争中的那些有利于这些行动的特征，并试图详细说明将运动特征和运动之外的政治环境与抗争轨迹联系起来的那些机理。

第三章考察了南非 1983 到 1990 年对种族隔离的抗争以及菲律宾 1983 到 1986 年对 marcos 独裁政权的抗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和菲律宾的反 marcos 抗争都是分散化的斗争，并由联盟或者总括机构汇聚和联合起来。两场运动都采用了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并且国家在这两场运动中都遇到合法性丧失的问题-在南非，这是由于非

白人人口拒绝政治改革，而在菲律宾，这是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在这两场运动中，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结合起来推动政治变革-在南非，它们是资本外逃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制裁，而在菲律宾，它们是资本外逃和美国的外交压力。

另外，我在第三章中探讨了为何武装抵抗运动单凭自己无法终结南非和菲律宾的压迫性统治。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该国内缺乏可以据以开展游击活动的基地。在菲律宾，新人民军所发动的共产主义叛乱正在扩大，但菲律宾的军队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而鉴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是不可能让一场共产主义的暴力反叛取得成功的，在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新人民军所发起的抵抗的文化便于进行动员的同时，我也承认，采用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培养支持力量，而如果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抗争者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支持。就南非的情况而言，如果抗争主要采用的是武力的手段，反种族隔离运动从南非的教会或者西方国家获得至关重要的支持的可能性就更低。在菲律宾，如果反 marcos 的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天主教会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机构支持这一抗争。

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缅甸 1988 年的民主运动和中国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南非和菲律宾的抗争在若干年的时间里积聚起动能，而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则在几个月持续的集体行动之后均遭到暴力镇压。缅甸的民主运动在采用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时具有令人吃惊的成效，中国的民主运动则几乎完全基于抗议和说服的方法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尽管这些方法显示了对政权抵制的程度以及中国的活动人士对他们事业的投入，仅仅这些方法却没有赋予抗争者相对于共产党政权的足以推动政治变革的影响力。妨碍这两场运动之抗争的关键因素是缺乏组织、缺乏自主的基础结构、以及在抗争期间缺乏来自国外的对政府的有效压力。

尽管有着这样的斗争结果，这两场抗争都有助于“非暴力抵抗文化”-这预示着持反对立场的民间社会的出现-的发展，以及活动人士国际网络-它们肯定会在将来的抗争中得到利用-的发展。

我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尼泊尔 1990 年的民主运动和泰国 1991-92 年的反军人政权运动。对尼泊尔君主政权的挑战以及对泰国军人统治的抗争都是由具有广泛支持基础的运动发起的，而这些运动依靠的是多个不同的反对派团体的协调行动。两场运动都善于采用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与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它们缺乏来自海外的关键支持-相比，尼泊尔和泰国的抗争都受益于外部的压力，尽管各自的方式不同。由于印度和国际捐赠方的压力，尼泊尔政府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而泰国政府所承受的国际压力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网络和新自由主义资本家传送的。

尼泊尔和泰国非武装反抗的成功与之前通过武装力量推翻政府的企图的失败形成对比。在 1960 年代初期，泰国的毛派共产党宣布，武装反抗是正确的革命战略，而且它开始在 1965 年与政府军队进行战斗。叛乱在 1960 和 1970 年代期间没有恶化，而游击运动在 1980 年代初期瓦解，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民主程序的增加、对脱离游击队之人士的赦免、和极右翼政治组织和民兵的民众动员（用以对抗乡村游击队），以及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发展投以更大的关注。尼泊尔的游击队起义在 1970 年代初期爆发于特莱地区-这里是尼泊尔的低地地区，靠近印度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不过，由于缺少广泛的支持基础以及政府镇压反叛的行动，它失败了。

在最后一章，我就非武装反抗如何以及为何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导致非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的问题下个总结。这六个案例中的抗争态势在被突出强调时相互参照了对方的情况，而且暴力的作用以及激进边缘势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被加以讨论。⁷ 我还找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训，活动人士们可能希望在他们的抗争行动中参考这些教训。

总而言之，我想就某些问题提出我清晰无误的看法。首先，我从未将非暴力理想化或者就暴力或非暴力做出任何道义上的论断。我认为，试图理解功利性非暴力行动的潜力和局限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而做到这一点最佳途径是以冷静的社会科学方法考察非暴力行动。另外，我从未宣称暴力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是无效的。肯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暴力可能是有正当性的，而且哪怕是极为浮光掠影地阅读历史课本也会找到非常多的关于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故事。还有，我没有宣告“历史的终结”或者就下述看法发表意见：世界正向这样一个时刻演进—届时，暴力斗争将无可避免地减少。我只是主张，二十世纪晚期有一个全球性的非武装反抗的浪潮，而且社会学家有必要去理解为何出现这种现象，以及非暴力行动在促进有些地方的政治转型时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没有在其他地区发挥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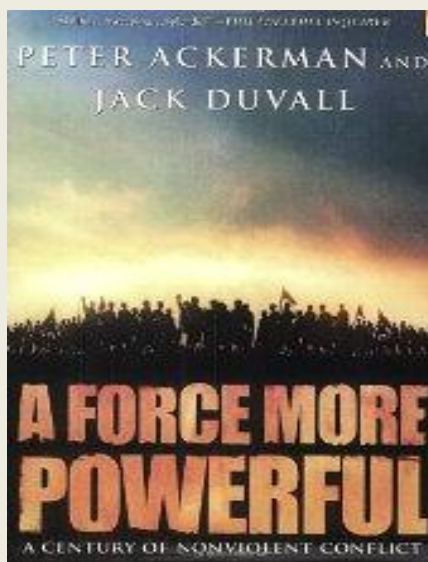
最后，我也没有将代议制民主加以理想化。我在本书中所指称的运动“结果”—也即，不管抗争是否促进了民主化，威权政体由此变得更加民主的进程—在很多方面只是斗争的开始。毫无疑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尊重、言论自由、权力分立、制度化的选举竞争、以及宪政规则—不管它们的落实情况如何地不完美—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不过，代议制民主并非政治进程的应许之地。民主化的过程通常会被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引向多元政体（也即布尔乔亚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方案，以免得让直接民主生根发芽（例如，参见 Robinson, 1996 年）。因此，民主转型只是为争取参与式民主政体的持续斗争的第一步。民主和威权政体绝不代表着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情形，而都是活动空间，在其中上演着主宰与抵抗的持续斗争。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可能会削弱明目张胆的政治威权主义，不过，反抗隐蔽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父权体制、种族主义、政治腐败、环境退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还在继续。若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向形式上的民主体制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上述抗争可以更有效地施展。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引言）

著：Peter Ackerman

Jack DuVall

译：张大军



书名：《A Force More Powerful—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

作者：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量，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

——帕斯卡尔

➤ 故事

在1981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就在这一刻，你们输了。”“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¹

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

圆桌会谈，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1990年成为波兰的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其他许多国家首脑一道在每年的九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先生和女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

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²

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阻遏，并且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于 1991 年站上莫斯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乔治·加蓬-在 1905 年说服 150,000 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二十世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全国性议会。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 1923 年抗击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撤出为止。
- 莫罕达斯·甘地在 1930-1931 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的长期努力。
-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的战争努力，并在 1944 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锁；纳粹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 1944 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
-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为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终结。
-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妈妈们被她们的政府在其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广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正面临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全民公决，它们将他赶下台。
-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马科斯于 1986 年盗取菲律宾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寡妇带领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而且他逃离了该国。

-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他们的民主体制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著的部分。
-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的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 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的与之相像的其他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 在 1990 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
- 在 1999-2000 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性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 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 图图，从丹麦国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以及二十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示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 1936 年拜访了莫罕达斯 甘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量。”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对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选择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律，他们就被迫拿起其他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 冲突

在二十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二十世纪所有冲突的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 迈向权力的运动 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以及波兰的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 抵抗恐怖行动 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二十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国人是如何在 1920 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丹麦人和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 1944 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而且它追述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 权利运动 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 暴力和力量 考察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先进的技术、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二十一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收益。其他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过，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二十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 1905 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利人在 1980 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安腾巴罗的电影 *甘地* 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是世界每一角落和二十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
- 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1986年垮台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人民力量”来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手可能是必要的，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立，或者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 “能够发挥很大的能量”

本书讲述的是，二十世纪的人们是如何发展出无需使用暴力而夺取权力的能力的。我们的每一则故事聚焦的都是非暴力行动在更大的冲突中的运用。为了说明非暴力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有选择地突出特定的事件和人物—他们对我们故事的重要性高于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或地区的整个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没有故意低估其他那些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故事的影响。比如，我们没有想要给出一部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瓦解的完整历史。我们确实努力要做一个公平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报告，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来帮助实现上述结果的。

所有历史著作都受其作者的视角的影响，我们的作品也不例外。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试图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将我们的大部分分析性思考留给每一章的总结部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评注性资料和解释性观念

的混合物，而这些资料和观念是针对由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的方式所引发的更大问题的。对于拥有下述观点，我们无须自责：如果被有效地加以运用，非暴力的惩处行动能够终结压制并让国家和民众获得解放，而且相比于诉诸暴力叛乱或恐怖手段，他们能够在做到这一点时面对更少的风险和更大的确定性。可是，它们不是总能发挥效用，当这样的时刻和我们的故事有关时，我们不会逃避谈论这些时刻。

我们还认为，非暴力抵抗应该得到比它已获得的所有关注更多的关注。在我们的时代，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新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历史被视为是一出戏。不过，如果历史被更为普遍地视为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的惩处行为的动态效果就会更容易获得认可。这种力量形式并不神秘；它施展的现实性与大部分人生活状态的现实性没有不同，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可以理解的。与犬儒式想法相反的是，非暴力行动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偶尔出现的烈士以及少数有超凡魅力的解放者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是关乎普通民众的，他们被吸引到伟大的事业中来，而这些事业是从头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讲述的是人们离弃工作待在家中或者占领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拒绝带身份证件，在他们的地下室印刷简讯，以及当他们被告知要离开时并不离开。

打破英国人盐业垄断的印度人、阻挠纳粹军事运输的丹麦人，组织起来反对独裁政权的智利人：许多采取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士凭直觉就意识到，力量源自他们做过什么，而不只是源自那些坐在宫殿或者总统官邸中的人士做过什么。以非暴力力量方面的杰出理论家吉恩·夏普的话来说，“非暴力行动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能够针对无情的统治者和军事政权发挥出很大的能量，因为它打击了所有等级式制度和政府最薄弱的方面：对被统治者的依靠。”

在上个世纪终结时，世界上的无线波段和书店中充满了回顾所谓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之一百年的素材。一卷卷的图书和一页页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大屠杀的情景—据说，这是战胜邪恶的可怕代价。可是，如果只以那种方式讲述的话，二十世纪冲突的历史将会加重一个可怕的错误：也即只有暴力才能战胜暴力，攸关最高利益的抗争必须以武装力量来完成。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同一个世纪，拥有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暴力武装优势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们在所有大陆上都被那些没有诉诸暴力的人士排挤出局？

有关冲突的最大的错误观念是，暴力总是力量的最终形式，而且推进正义事业或者击败非正义的所有其他方法都无法超越它。可是，俄罗斯人、印度人、波兰人、丹麦人、萨尔瓦多人、非裔美国人、智利人、南非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证明，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因另一方使用暴力而预先被限定，而且其他的非暴力措施可能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上个世纪被迫做出的生命和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在未来的一百年间有所回报，这其中的原因就将是，上述真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理解。

大学论坛

编者按：本期开始我们增设了“大学讲坛”板块，拣选最近由傅知行参与安排的大学讲座录音整理奉献给大家，本期我们选登了郭宇宽4月21日在北师大做的题为《边缘的孩子——京沪农民工子弟成长状况的调查报告》的主题报告。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类比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制度的不完善制约着人口的正常流动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比法国的移民政策，可以看出中国在此处的不足之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并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其下一代的归属成为一个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作者通过对上海和北京的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学生的跟踪调查，展示了一些关于农民工下一代的生存现状，并提出一些有利于这些夹缝中孩子成长的建议。

■ 边缘的孩子——京沪农民工子弟成长状况的调查报告

[郭宇宽](#)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农民之子中国转型论坛，自08年11月份的首次开讲，到了今天已经是第17期了，一路走来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老师。郭宇宽老师是江苏南京人，2000年毕业于西安交大，1999年获得国际辩论赛最佳辩手；2003年于西安交大获管理学硕士学位；08年获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郭老师正可谓是阅历丰富，06年至今，任美国大学中译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到2003年先后主持湖南卫视的《步步为营》节目及《新青年》栏目；03年加盟央视任首席记者；04年到05年中央电视台《成长在线》主持人、主编；05年到06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出任策划、出境记者；06年到07年任《市民杂志》副总编；并以自由撰稿人跟《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瞭望东方》等媒体撰稿，是智力的传播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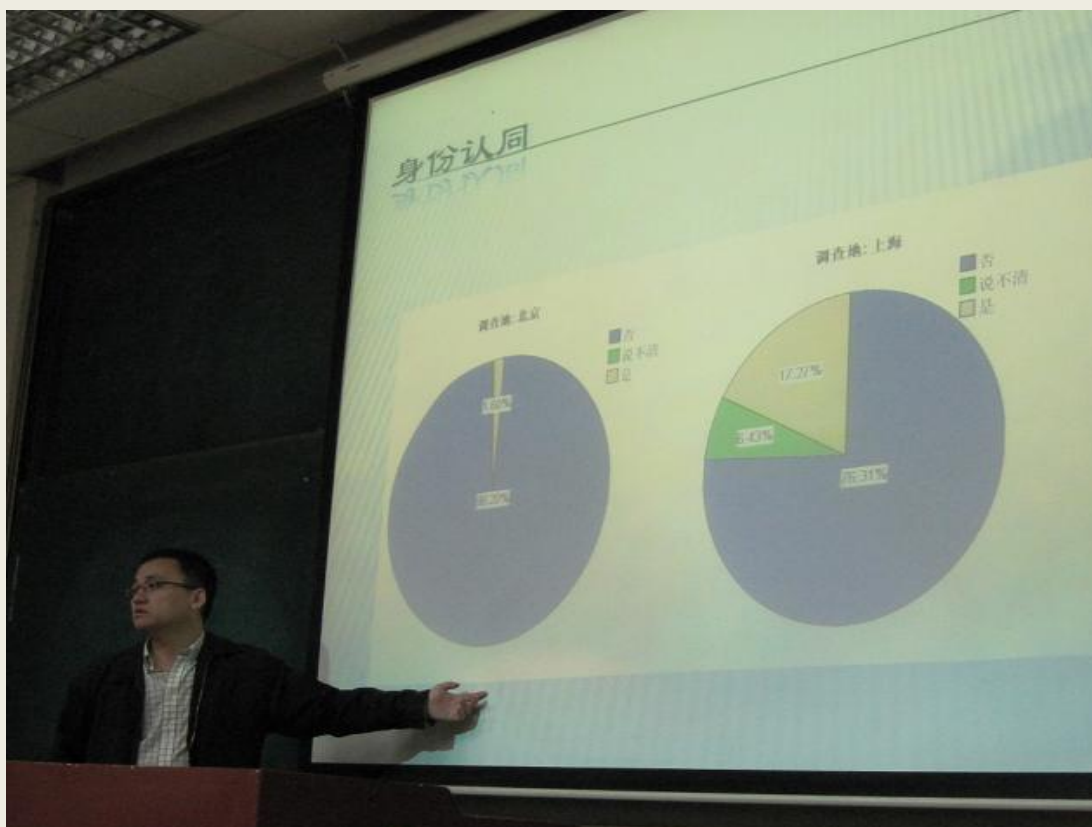
郭老师对北京、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最终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有深刻、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就邀请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流动儿童的生活状况。大家欢迎！

郭宇宽：非常感谢大家，相当的感谢！我想今天我在农民之子讲的这个题目，可能和大家平时关注的领域不大一样，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农民工之子”。农民工之子是现在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属于在中国最不被人待见的一个群体。农民之子现在已经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号，也有很多中央的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但是对于城市的市民，比如说北京、上海的这些市民更不用说了。而夹在中间这样一个身份模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从我的角度关注的一个重点。

大家看我这个（PPT），我的第一页用的是一个灵壁石，灵壁石是很高级的势头，长的都七形怪状。在我看来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跟石头一样，比如说你看一个石头，你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跟它在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受到的挤压，也许雨水的冲击，也许水流，也许阳光日晒，这种经历最后在它身上留下烙印，最后它成为一块石头，而每一块石头跟别的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假设，我觉得人也是跟石头一样，你看每一个人长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可能达到的成就和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时候研究农民工子弟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群体未来是一个社会动荡因子，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即使在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对于移民依然有很多的歧视，假如说在美国的话，你是一个非洲裔的或者是拉丁裔的，同时又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能你也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感觉到你比较边缘化，甚至别人会说你这个群体犯罪率很高，素质很低。但是如果你把一个人当做一个石头的话，你整个感觉就会不一样。哪怕你感觉奇奇怪怪的人，他怎么从孩子一步步长大的，也许你现在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是坐台小姐或者是一个小偷，或者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素质不高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他小学时候写的作文本，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个人讨厌，你会感到一种心里的莫名的感受，哪怕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了他的这样的性格，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假设。

我们下面来展示一下我们关注的问题，法国 2005 年产生了一次很著名的“巴黎骚乱”，这个骚乱的导火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孩不懂事，可能闹一闹，然后被警察打了，后来愈演愈烈，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大动荡。一开始的时候，像萨科奇这些人都说这些都是街头小混混，不值一提，但是后来整个是席卷巴黎，波及到法国的很多地方。但是你观察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法国移民的第二代，为什么是移民的第二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街头骚乱的这些年轻人，年富力强，工作情况不是理想。为什么移民的第一代不容易产生，虽然有很多的不满，那时候条件更差，没有产生很大规模的骚乱。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法国这么好的地方，巴黎至少比北京、上海的条件还要强。



（图为郭宇宽在《边缘的孩子——京沪农民工子弟成长状况的调查报告》的讲座现场）

一个非洲的移民，法属殖民地，跑到巴黎来打工，住的再差，吃的再差，比他家庭里面，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那种艰苦，他都觉得挺好，有什么不满意，法国也还对得起我，他会有这种感觉。假如我们设想，这个北朝鲜的

难民跑到北京来，没有被我们的武警遣散，在北京落脚了。你们北师大的学生假如毕业了，我这个工作给你，一个月管吃管住，每个月给你发 200 块钱零花钱，你肯定不干，干这活，太不象话了。但是要是一个北朝鲜的难民，你要说我管你吃饱，一个月给你 50 块钱零花钱，你都谢天谢地了，真是太好了，来这儿就没有什么奢望，太棒了。但是如果他在这里生活，他的第二代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二代和北京的孩子、上海的孩子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里一块长大，你看了北京奥运会，我也看了北京奥运会，咱们都是一样的。结果等到 20 岁，咱们要找工作的时候，你找到了工作，这些难民一看，法国人那么好找工作，我们找不到，他的这种情绪就很容易爆发，这种不公平感就非常明显。

这是不是歧视呢？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北京假如说我开了一个小超市，我现在招一个收银员，我招这个收银员我绝对不歧视，我就招人。结果有两个人来报名，一个人北京户口，街坊从小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来我这儿当收银员，肯定没有问题。同样一个人，长的一表人才，能力也没有问题，一说什么河南驻马店，在这儿没亲没顾，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敢招他当收银员吗？这不是一种歧视的？这个歧视在哪个社会里面都是一样，法国也是一样。法国从二战以后，经济开始飞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它的殖民地开始独立，有大量的人开始涌入法国，这个过程，从法国的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潮，到它的 2005 年第二代移民成长起来，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中国开始社会的流动，开始有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或者说农民工现象，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说，比法国大概晚了十几年、二十年，有这样一批人开始进入北京、上海打工。

最早的是盲流，就是农闲的时候过来，打点零工过去，当小保姆。后来渐渐长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在这里谋生。那么这些人的孩子，很多是出生在北京、上海，他们的问题什么时候会在中国被注意到，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巴黎骚乱以后，法国的社会有哪些反思呢？法国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结果你对咱移民来的哥们不仗义，怎么不仗义呢？你说移民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得不到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尤其是在第二代身上，他们的感受更加强烈。法国是这样反思的，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任何反思呢？至少在国家层面看不到，我们的国家层面目前的主旋律还是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看这个亚克西的问题未来怎么样爆发出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涉及研究，从去年开始。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希望找到在北京和上海各 500 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孩，是抽样，北京 10 所学校，上海 10 所学校，每个学校抽大约 50 个小孩，而且年龄段集中在 10 周岁左右的小孩。因为我们估计 10 岁的小孩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是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从 10 岁的小孩一直跟踪起，如果我们能对样本群体跟踪 5 年甚至 10 年，我们就能看出来是什么样的经历会塑造他的成长。未来 10 年以后，我相信这些小孩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也许里面黑社会的也有，也许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也有，也许做一些很不道德的职业可能也有。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追溯，是什么样的经历、成长环境使不同的小孩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最后我们看到他的成长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些就是在他们家庭里的照片，看起来肯定没有法国那些移民住的好，法国的北非移民都有政府跟他们盖的房子，上的都是公立学校，跟大家一块上学。你看北京一个家庭，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打工子弟的家庭。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调查的问卷，我抽出一些调查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中间体现出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在北京这 500 个小孩的出生地都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其中 41.6% 来自于河南，河南人口压力比较大，当地就业情况不理想，所以河南人在北京是最主要的移民群体，接下来是河北、安徽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数字，10% 的小孩就已经在北京出生的，也就是说 10 年以前他们的父母就已经来了北京，在北京出生、成长已经 10 年了。数字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的内力，你调查出来的数字跟它的结构非常近似，虽然北京、上海离的非常

远。在上海最主要的打工者群体是安徽人，也是基本上 10% 的小孩 10 年前在上海出生的。这个数字也基本上也完全一致，河南和安徽省。这是父亲的籍贯（PPT）。我们看看兄弟姐妹的数量，也是高度温和，基本上大约在 80% 左右都不是独生子女，而且还不排除以后还有其他的孩子，家庭规模还在增长。有很多二、三个兄弟姐妹的比例占的相当大。家中排行可以推算出来，大概 10 岁左右的小孩很大比例是老大，也就是说大概 10 年前，大家可以估计就是邓小平 92 南巡讲话之后那一批城市流动的潮流，来到这里，开始定居，安定下来以后开始在这里生孩子，或者说在这里打工几年以后，积累了一定的条件以后，比如说最早住工棚的时候，肯定不能把孩子、家里人带来一起同住。当他在有稍微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从家乡带来一块住，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功夫，大家可以推算。

我们曾经估计说这些打工子弟的家庭是一些破碎的家庭比较多，在我们做这个研究之前，会觉得这个家庭可能是单亲家庭或者说母亲在这里带着孩子，父亲在别的地方打工啊。结果我们发现，像这些家庭完整的比例数高，基本上都是比较完整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是整个家庭到北京、上海来，有长期居住的打算，我一家人就在这里过日子。那么普遍的和父母同住，跟兄弟姐妹，还有同辈人、父辈人，甚至爷爷奶奶都在这里。我们再看另一个（PPT），一个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所成长中间交往的圈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亲戚之间的紧密程度，比如说假如是北京、上海的小孩，问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会增加北京、上海本地户籍小孩的样本。比如说你问北京、上海的小孩，多长时间会去走一次亲戚，这个时间肯定比较长，城里人好像不是很爱走亲戚，但是你看他们这个群体，80% 以上一周好几次走亲戚，这体现什么呢？一是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工作生活，就很强的血缘的关系、亲缘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干的不错，跟家里人打一个电话，北京人少钱多，快来，大家都来了，都是亲戚，这帮人相互帮助，在这里发展。另外也说明，他们的资源圈子跟交往的圈子，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一种群体。

我们看看职业，这个体现出很大的差别，我们接下来看这种差别对小孩的性格会有什么的影响。在北京最主要的工作机会，像个体零售业、手工业，什么叫个体零售业？比如说在学校门口削菠萝，卖一些什么东西。而在上海排名第一的是建筑工人，在上海的产业工人群体非常的突出。跟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上海有很多的产业工人。我们看看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一致，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两个数字都完全一样，小数点后头都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都是母亲一方没有工作，这也说明这个群体的一种共性。但是又有个性，比如说在北京，母亲也是服务性行业、个体零售业比例最大。而在上海最高的是工厂的女工，上海现在很多纺织加工企业，大量的女工。我们下面会分析不同的父母职业对小孩的世界观和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这里有上海父母的收入的大概数字，因为有一些小孩很糊涂，或者说你问他父母挣多少钱，大多数 10 岁左右的小孩对钱的概念还不清晰，但是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我问他回去把你的父母收入问一问，咱们不是税务局的，我们是研究需要。我问回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平均收入在上海父亲是 2 千多，母亲是 1 千多，这个大概跟我们的预测是差不多的。但是这几个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 10 多块钱、100 块钱，我们说是不是瞎写的，他们说也不是瞎写的，这样人一般父母没有工作，可能是上个月干了什么挣了点钱，就属于没有工作的，但是这个非常少。我们看一下有些收入非常高，比如说有 3 万的，在北京也有，这收入不错啊，咱们北师大一般的毕业生是达不到这个收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样的工作一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而且基本上可以算是小企业家的群体，一般是什么样的小企业呢？比如说收废品，在北京我这个小区垄断，我收费，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而且有非常强烈的地方行会的特点，在北京北师大这一片收废品，我垄断了，这个是老大层干的事，这样成功的企业家在这个群体也有不少。

一般来说，比如说在北京，收废品的被河南人垄断，而河南垄断的还分一些区域，比如你是固始人，在北京

东城区、西城区划了几个片区，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你只能在这个地方收，你要到这个小区，别人把你打出去，是这样一个势力。在上海也差不多。

我们看一看收入的分布情况，从事个体零售业的，我们可以理解有一定企业家精神的工作，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父亲的工作，一个月 3000 多，在北京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不错的收入。女性的工作收入水平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比例基本上比男性低了快一半，这也体现这个群体的权利结构。我们看一看住房面积，记得我们前面看的那个，这些人来到北京，一个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百分之好几十都跟其他同辈人、亲友一块同住，家庭的面积通常是多少？最集中的基本上是 40 平米，这 40 平米当然作为学生宿舍很宽敞，但是对于五口之家，40 平米还是比较拥挤的。我们看到有几个数字为什么那么高呢？这个一般是在城乡接合部，在城乡接合部有的人是收废品的，这个面积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后面有两间房子住，前面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我堆废品的地方，有 200 平米，有这样的人。在孩子的概念中，问他你们家有多少面积，他说我们家有 300 平米，这个是很牛的，当然这样的家庭也是高收入的家庭。

我们看这些小孩的零花钱，很不一样，小孩的零花钱的概念，很多小孩认为，尤其是产业工人，需要在外面吃早餐，需要在学校出一顿中餐，他们上学的地方离住地距离比较远，如果带上吃饭的钱的话，这些孩子一般每个月的零花钱至少也要 100 多、200，有的三四百的也有，最少的一个月几十块钱的，这个就是坐车的钱。这些小孩有的时候中午还跑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烧饭，是这样的家庭。这个就比较独特的，你最近两年搬家次数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搬过家。而且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北京最突出的原因是拆迁，就在我们刚调查完的 10 所学校，结果在过完春节已经被人拆掉两所。转学率 45%，80% 以上都转过学，像这样的，大概 20% 转学 3 次，这个小孩才 10 岁，小学 3 年级转学 3 次，那对他的生活是相当的不稳定。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问题，就问这些小孩，你喜欢城里的学校还是喜欢老家的学校，你看一条柱子代表北京的，一条柱子代表上海的，这个比例都差不多，基本上 70% 左右都说我还喜欢北京的学校、上海的学校。但是你们再看看北京、上海打工子弟的学校简直烂的不得得了。尽管这么烂，大家看后面这个原因，为什么喜欢北京、上海的学校？说学校硬件比较好，教师水平高，还有其他原因。唯一上学开不开心，不怎么开心，很少小孩说在城市学校里面上学开心，但是都说在北京、上海学校上学，教师水平高，硬件设备好。你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还是在要求所谓照顾留守儿童，解决乡村义务教育。你可想而知，北京、上海那么烂的打工子弟学校，硬件水平比他们老家还是好。在北京的打工子弟的老师一个月工资大概 800 多块钱，这样的工资水平能招到什么素质的老师，可想而知。但是就这样他还觉得师资条件比老家好。

这个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课后有没有人辅导你的工作，有的比例不到一半，而这个数字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在上海老师给学生课外辅导功课比较普遍，北京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数据是说，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平均工资已经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补贴，比北京略高的这么四五百块钱，以次推测，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里面的老师更加有责任心，课后还给学生辅导功课，这的比例比北京高出了一倍。我们看看做家务比例，这个就体现群体的特点了，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在家里面做家务，而这个做家务不是一般意义上做家务，大家看看这个时间，最厉害的是一天做两三个小时，最起码也是一个小时，反正一天都做不了半个小时家务，这帮小孩 10 岁，你说谁家的孩子这么能干。

看这个数字，早晨一般几点钟起床，因为我们要分析大概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早上一般八点钟起床，这帮小孩平均集中早晨起来的时候是 5 点多钟，为什么起这么早呢？也很简单，比如说产业工人，父母要赶着上班，比如说做小买卖的，父母早晨六七点钟到菜市场出摊，父母出摊不能把小孩留在家里，锁上门，所以父母早上出摊前就要把小孩给送到学校去，或者让他自己坐早班车去学校。一般在北京，比如说早晨是菜市场 6 点多钟

开始出摊，在这个之前，你算一下这个小孩要几点钟被父母拉起来。这个跟城里的小孩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字就是说问他去过肯德基和麦当劳吗？为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麦当劳和肯德基应该比较象征代表城市的生活，快节奏的，比较都市的、时尚的生活，这个比例都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几，基本上4个里面3个小孩都说去过，而且还有一些小孩问的时候，你多长时间去一次啊，经常吃。

在这个里面有的可能是这样，有的可能是水分，他们可能觉得我去吃肯德基那是有面子，我们家有条件，每天中午去吃。其实你看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显然不可能经常去吃的。我们问他希望多久去一次，很多小孩都说一周去好几次，经常去吃肯德基、麦当劳，尽管我也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但是跟小孩不一样。我们看这个，问他说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你是不是北京人，你在北京也生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北京人，在北京说是的比例1.6%，我们记得前面那个数字，大概10%出生在北京，但是我出生在北京，我不是北京。比如说你出生在纽约，你肯定把自己当成纽约人，但是你出生在北京不是。这个比例在上海高一点，在上海17%的人说自己是上海人，说我就是上海人。这个有两种假设，我们要去推敲，一种假设说上海更加开放，上海海纳百川，你来的人就是上海人。但是另一种假设，是说上海的身份歧视更强，比如说你在北京的话，大家好像对于身份不是很强调，你不见得一定要是北京人。比如说我在北京也很多年，刚才主持人介绍我说我是南京人，我也乐意把自己当成南京人，我们没有必要硬要做北京人。但是你在上海，如果你不是上海人，感觉就很别扭。哪怕你理解为卖身投靠也好，很多人更加迫切的愿望就是要成为上海人。

什么样的人算是本地人？我们就问这些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人，你说你是上海人，你为什么是上海人啊，你给我讲一讲。很多人都说我生活在上海，我主要生活区域在上海，我就是上海人，他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反过来说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人，很大的比例说什么人算是上海人，说会说上海话，我不会说上海话，所以我不是上海人。

我们再看看这些圈子的社交，我们让他说，比如说这个小孩你今年给我说出三个觉得最好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三个小朋友都是哪里的人。在北京数字高度一致河南人，这说明什么呢？河南人还和河南人交朋友，安徽人还和安徽人交朋友。他们的交往圈子高度的认同还是在自己的老乡群体里面。上海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也许是未来城市化的比较重点的突破点，在上海有29%，这是相当大的比例，说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张三，张三是哪里人啊？不知道。这就说明什么？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已经谈话了身份和地缘的属性，比如说我交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反正从小跟我一块玩，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哪里人，反正我们都在上海，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我们问这个小孩在哪儿上网，这个上网的比例也是高度一致，大概到了10岁的小孩，81.8%都开始上网，但是上网的地方各不一样。在上海是在网吧比较多，在北京在家里比较多。这个体现上海和北京的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别，问小孩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你理想的收入，就是你将来想挣多少钱，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比较开心，就是够花了。结果我们发现，够花的比例差别的并不是很大，在北京和上海基本上什么样的钱够花，在北京小孩的概念中我有2千5，花天酒地，怎么花都够了，没有问题。在上海基本上2千够花了。但是你理想的目标你要挣多少钱，我不光够花了，我还可以光宗耀祖，我还可以给我爹妈花，还有家庭责任，这个北京和上海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北京这个数字非常集中的比较高，中位数是7千，我目标一个月将来怎么也得挣7千，很多人相当高的比例说一个月挣2万以上。而在上海的人，上海人比较务实，说你挣多少钱，说平均大概挣2千就可以的。这非常鲜明的体现出，来到北京和上海以后，这两个城市对人的性质塑造，这个好理解，北京人比较爱吹牛嘛，比较好高骛远，说你挣多少，最近做什么生意，做大生意，肯定都是这样。

我们问这些小孩，以后像做什么工作，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做什么工作，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做什么工

作最赚钱，最有钱。想做什么工作，这个很好理解，小孩们都比较崇拜教师，人民教师很光荣。但是北京的小孩是这个数字，我们以后要开公司，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他们心目中开公司就是成功人士。北京小孩还有说当明星。上海的小孩说什么呢？专业人员比较多，消防员、警察比较多，医护人员比较多。上海的小孩想象出来将来想做的职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北京的小孩当明星，开公司，都是比较牛一点。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最不想干什么，你看这个数字，北京的小孩最不想干服务性的行业，就是咱也是爷了，你让我伺候人不干。北京的小孩还最讨厌收废品，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这样。上海的小孩最不喜欢什么呢？建筑工人，其他的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职业，就不说了，工厂工人，就是产业工人。

觉得什么公司最赚钱，大家注意到这两个数据不一样，有一些小孩他觉得什么工作最赚钱，但是理想并不是做最赚钱的工作。但是有的小孩，未来的分析很有意思，什么样的小孩他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份最赚钱的工作，可能有一个比较有企业家精神的小孩群体，有一个是比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小孩群体。北京的小孩都觉得开公司、当明星最赚钱，上海的小孩认为开公司也认可，但是比例比较少，这体现上海的文化特点，做白领，都市白领，上海的文化氛围做白领最赚钱，在北京几乎太少了。上海小孩觉得我能做一个小生意已经可以了。

这个数据仅供参考了，尽管在城市里面生活，他们生存的这么边缘化，条件这样的苦，问他们说以后要在哪里生活，这个数字都完全一致，85%、86%，我以后就要留在城市。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执政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准备的，从心理的准备到政策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就是这帮人你怎么办？不管有什么政策，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从小就说我就要留在北京、上海。原来我们老一辈人你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什么时候不想要了，遣散农民工。这帮小孩我就是在北京长大，我别的地方没有家，我就要在这里。

我们下面分析一下一个人认为自己认同的城市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跟什么样的因素有关？我们发现跟他的交往圈子里面，我们前面列举了你有3个朋友，中间有没有北京、上海的当地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分析的这个（PPT），也是高度的相关，事后我们做一下验证，我们本来推想的就可以知道是相关的。他的朋友籍贯和他父亲的籍贯基本上高度相关，基本上安徽人跟安徽人交朋友，河南人跟河南人交朋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曾经设想有几个试一试相关不相关，比如说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跟你认同不认同城市，相关性怎么样？发现不大。有的人想回农村，他也一样喜欢吃肯德基，这个相关性不大。但是上网跟这个相关性挺大的，基本上上网的人更愿意接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城市人。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小孩，什么样的小孩最想做赚钱的工作，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最能赚钱，什么就是我的理想。你看这个比例比较高的是什么呢？当然个体户家庭是比较高的，企业家也比较高，还有什么呢？建筑工人，建筑工人的小孩非常想赚钱，服务性行业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的数字怎么理解，什么刺激这些小孩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清晰的概念，我们要做最赚钱的工作，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觉得因素很多，但是至少有一个是肯定的，他父母的职业和他接触到的群体。为什么说北京建筑工人的小孩非常想赚钱，北京在建筑工地抡大锤一天60，盖起来的房子一平米3万，给这小孩带来的刺激，不赚钱没有办法活啊，无地置身。至于服务性行业，就是父母有一方是服务型行业的，在北京特别明显，他特别想以后要赚钱，也好理解。比如说母亲在人家家里当保姆，一个月2千，一看有钱人这么生活，有钱人日子过的太好了，他受到这种刺激，他会树立人生标准，我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妈是给人家当保姆的，我以后不能干这个，我以后得做人上人。

我们反过来看，什么样的职业最讨厌？发现有相当的比例，这百分之几十已经不是能用凑巧来解释的，天底下这么多职业，我最讨厌的职业就是我父母干的那个职业，就说明这些孩子在成长中间，对他父母的人生就是不满意的，他父母完全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移民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一样，移民的第一代，我到城里来，我能找一个人家做保姆，一个月挣2千多，我相当可以了，在老家一年下来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

已经非常满足了。但是对他的孩子来说，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样的职业最招人讨厌？在北京是收废品，收废品在北京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职业，但是这些孩子最讨厌收废品。还有当散工，散工就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今天帮人家打打零工什么的，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北京的孩子也很讨厌服务性行业。

这是我们今天的汇报，下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未来做研究要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前面讲了，说这些小孩从小都有远大的理想，树立了目标，以后就要在北京、上海生活，有的人说一个月要挣 2 万，要开公司，要当明星。现在这些小孩，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心理烦恼和痛苦，但是基本上他的人生观都是积极向上的，你从他的职业选择里面看，都是以后我当教师，我当警察，我当科学家，跟城里的孩子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当他们的目标，我们再预想，现在他们小学 4 年级，到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理想跟现实给他们提供的机会会产生碰撞，最简单的碰撞，就是学习机会。比如说你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孩，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得回你原籍，而且回你原籍，你在北京受的教育跟原籍又对应不上，高考题也不一样，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些小孩没有高考的机会。没有高考的机会，怎么当科学家？怎么当警察呢？当教师呢？这些人生理想到时候就会遇到挫折。再有一些小孩说以后开公司，挣 2 万，这些到什么时候会产生挫折呢。

那么假如说是一个城市的小孩，比如说一个北京小孩，开公司不是人人都能开的，城市的小孩靠着爹妈找一个工作，一个月挣几千，家里有房子，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在未来，家里也给他压力，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如果梦想在什么时候开始被现实所击碎，那个时候他们的性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会怎么适应这个条件。最后的歧视，我们的这个国家虽然每年春节晚会都表演一遍中央政策，但是在北京这个群体已经 30 多万或者 50 万了，上海也是这样规模的群体，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群体，有没有为他们的未来做任何政策上的准备？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所做的工作。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



（图为讲座现场）

主持人：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刚才老师通过法国巴黎的骚乱引进了流动儿童的一些探讨。下面是提问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困惑一起交流交流。

提问：你刚才说打工子弟的小孩以后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现在调查他们可不可以上高中，他们到北京的高中，然后参加高考。

郭宇宽：情况是这样，首先他们这些孩子天然的跟北京孩子的差别在于，基本上都不会英语，在北京上小学的孩子，很多上初中的时候英语就不错了。但是他们虽然都有英语课，英语老师都不会英语，所以上了 10 年的英语课基本上能把 ABCD 认全就不错了。这个在参加考虑的时候有天然的不一样。另一个现在的高考制度，我们就不说他不会英语，就算他家里有钱，请了家庭教师，或者交赞助费，未来送进了北京当地的学校，也是不会英语。他们到了高考的时候不能享受北京小孩的待遇。你们大学生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过一个统计，是去年数据统计，以单位人口来算，在北京和上海的话，基本上每 1.9 万人左右，可以有 1 个小孩考上北大和清华。在河南大概 30 万居民才能够有一个居民考上北大、清华。

你在北京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小孩，如果你不幸投胎在了河南或者说安徽，或者说江苏、河北，或者说各种地方，基本上你能考上郑州大学已经非常不错了。这就是中国高考制度性的不公平，就决定了他们本来起点就低，而且更加不公平。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大多数这些小孩一旦到了初中的时候，就还是考虑要么跟着父母打工，要么有一些条件好的可以上一些技术学校。那么我们常规的解释都说，教育的职能是使社会阶层能够有上升的通道，能使社会的每一个群体都有机会，但是至少在北京和上海，我们调查了解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教育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重复那个阶层再生产，基本上你是一个农民工的小孩，你跟北京、上海的小孩相比上学的途径非常小，你不可能以他们的那种上学途径去上学。比如说你在北京，你投胎投的好，投到北京了，反正不怎么费力考上一个名牌大学，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像这样的上升途径不存在。

提问：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困惑，你刚才提到北京、上海的小孩更加希望未来继续在城里生活、打工，我不知道你的调查里面有没有涉及到，为什么这么选择，或者你有没有一些鲜活的例子。

郭宇宽：这本身就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些小孩我们有问题就问他，你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开心不开心，有很多的比例都说不开心。说我在北京、上海活的不开心，问他们为什么呢？周围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跟贫苦区差不多，杂乱，问他们说生活边上能有公园吗？没有，不可能有，边上就是垃圾堆，就是收垃圾。这样的成长环境很不快乐，但是即使这样，你问他说以后要不要回老家，还是不愿意回。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求解的一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对你研究的方法非常感兴趣，因为你提到调查孩子们的住房面积等，这些概念都比较抽象，对孩子来说通过哪些手段来传递具体的信息和内容呢？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孩子们回答不太真实的信息，比如说吃麦当劳的次数这类的信息，怎么来验证它的不真实性，对你的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呢？

郭宇宽：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间我们只是需要知道他的态度就可以了，比如说你问他喜欢不喜欢吃麦当劳，平时吃没有吃过。哪怕没有吃过，但是他回答吃过，这至少态度是非常清晰的，他认为我说我吃麦当劳是很有面子的，这玩意时尚，我喜欢。甚至有的小孩，他穿一个假名牌，你问他说这是不是假的，他说真的。我们并不是要搞清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他对城市生活，对于一些时尚符号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已经我们搞清楚了。

你说问题比较抽象，比如说认同这个问题，像我今天的总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他的社会身份认同确实很抽象。但是我们提炼这个概念所依靠的问题基础，对这些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他的认同其实就决定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他肯定傻了，他不会回答。但是你问他，你是河南人还是北京人，他肯定告诉你，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甚至有的人告诉你，比如说有的河南小孩，你问他你是河南人还是北京人，说我不是河南人，也不是北

京人，我是固始人，是河南的一个很大的县，这就体现了他们对于认同的概念是什么。

再比如说，他的认同也是体现在，你要问他说北京和上海笼统的喜欢不喜欢，他们说不出来。你问他说，周末去什么地方比较开心啊，他会说上海的什么外滩，去了一次真好，说北京的动物园去看过，太好了，这个就反应他们的认同。所以我们对这些小孩的问题，肯定是在他小的时候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些更加抽象的问题，比如说他怎么理解正义，怎么理解公平，或者说我们在明年、后年的中间会体现出来，当这个小孩开始产生朦胧的爱情，我们会问他怎么理解这个，都会有专门的涉及。谢谢！

提问：比如说住房的面积，我到现在对多少平方米还不是很清晰的概念，这样的话调查是孩子还是他的家长？

郭宇宽：调查孩子，有的情况让孩子回去了解。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家庭背景？你为什么会对现在家里住房面积还不了解呢？

提问：我小时肯定不了解，现在还凑合。比方说 90 平方米或者 100 平方，不是特别清晰具体的概念。

郭宇宽：一种可能是我们过去学过机械制图，有的人天生空间想象能力比较差，我对空间没有概念。还有一种，是不是你从小生长的环境房子比较宽敞。

提问：我生长的环境是两种，一种是老家特别大的院子。

郭宇宽：你如果是在老家生活的那种环境的话，确实对住房面积不敏感，因为你问那些农村孩子说家里多大面积，他确实说不出来，好大一个院子，他只会说有两间还是三间正房，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你在北京、上海生活，你对住房面积会非常的敏感，小孩之间都会相互比，说你家有多大，我们家有多大，这是一个成长环境塑造的。

提问：我还有一个很好奇，刚才你提到，孩子们说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不开心，我想知道，如果跟当地孩子比较的话，这种不开心是普遍存在的，也许他们都觉得学习压力太大，所以这种不开心。

郭宇宽：有可能。

提问：你问那些孩子去没有去过麦当劳，其实他们没有去过，也会觉得去过，这是不是一种虚荣心？他不是从农民工子弟这种心态去回答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般心理特征。

郭宇宽：一般的孩子心理特征肯定是有，比如说小孩都有虚荣，但是虚荣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问农民工子弟的小孩说去没去过麦当劳，没有去过说去过，那已经是虚荣了。你问一个北京、上海的小孩，他绝对不会觉得去麦当劳是一种虚荣，太普通了。你要问他说，去没有去过凯丁斯基吃饭，他没有去过，他说他天天去，那叫虚荣。你爸开什么车送你上班，明明是骑自行车送他上班，说我爸开奔驰送我上班，那叫虚荣。这种小孩的心理结构，我们的基本研究假设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同的环境会塑造他们不同的观念。

提问：你说这个研究是追踪研究，像上海和北京各 500 个，怎么保证能够追踪下去，因为我觉得流动性会增加难度？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课题是监督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是吗？

郭宇宽：不完全是。

提问：想问一下你对这个生存状态是怎么看的？具体的指标是什么？

郭宇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你说那个指标是什么，我现在没有清晰的指标，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研究中间，都会发生新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想搞清楚，这些小孩是怎么成长，他现在的成长过程会和 10 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小孩长成的样子是什么因果逻辑关系。我无法在现在设计出指标来，这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的魅力，好的研究应该让你觉得最后看到的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为什么说是意料之外呢？就是你最初的那些假设，可能最后发现成立不了。你最后得出来了的结论跟最初的假设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一解释，又觉得是情理之中。这就是社会科学逼着你最后通过实践以后，颠覆你原来的假设。如果我们在几年中间，每一年我想我们关注的重点都会转移，都会变化。我们没有从一开始设定一个特别具体的指标或者说研究规划，但是每一年的推

进都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个研究的魅力所在，因为有的东西确实以我目前做的文献跟踪，国内对于农民工子弟的研究，还没有提出很详细的和好的样本，或者说在有一些问题上跟我们一些启示。我们觉得有一个好的研究典范，是美国在大萧条年代，有几个社会学家做的大萧条的孩子，但那个研究样本原则上没有我们这个大。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你说靠什么能使 1000 多个小孩一直跟踪下去，可以说非常难，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要做到，第一个最简单的，花钱，这个资金得保证，所以我搞这个最累的就是筹资，到处去筹资。第二个，我们做这个实验，我们带着研究小老鼠的这种态度，好像这是一群小老鼠，你和他们之间没有建立感情。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间我们研究团队，像北京、上海的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志愿者，都和这些小孩建立一种信任和默契。同样做一个调查，如果让这些小孩认为你就为了搞课题，把我当小白老鼠看一看，他会觉得跟你没劲。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让这个小孩觉得有一些人在关心他们，对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关注，那他会乐意接受。那从技术上来讲，我们调查中间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除了调查你现在在这个班，在这个学校，我们还要调查说，问清楚你老家的通讯是什么，你父母的手机是多少。现在有一些小孩已经开始上网了，我们还要问他会上网的 QQ 号码是多少。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这些小孩未来能够继续跟踪，当然跟踪成本会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做的文献，那些社科院搞的这些课题里面，能够把这个群体跟踪上两三年的还非常少，这也是我们的挑战。谢谢！

提问：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我本来也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问了。另外一个，根据你的调查，你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京沪两地的生活环境，还是改善他们在家乡的生存环境，吸引他们父母回乡工作，这样对他们成长更有利？

郭宇宽：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最主流的一个政策争论，而现在在政策方面的主流意见其实是非常愚昧的，还是在力图让这些回到家乡。但他们又说的非常暧昧，说我还希望你作为城市劳动力，比如说北京需要保姆的时候，我说你来吧。但是你要说我在你家做保姆，你的孩子上小学了，我的孩子也要上小学，这时候就表现出特别虚伪的一面，我们来建设新农村，我把农村小学建设好，你回农村上小学去吧。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策目前只想从移民中间把他们当做一个劳动力，当做一个可以暂使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脑子也非常进水，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还在大声疾呼说要改善家乡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这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讲不通的，人家父母已经到北京、上海来了，都在这儿工作，你的意思说改善家乡的教学条件，还让孩子在家乡读书，这叫什么事？这讲不通啊。

像你说的改善北京、上海的生活条件，我倒不主张改善北京、上海的生活条件，因为生活条件这个指标是很难说的，改善到什么算是公平？你总不能说给每个人发一套房，法国是这样的，跟你盖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但是你给人家这样的房子人家还是不满意啊，最关键的，我觉得这种救济不是生活福利上给点什么，而是权利救济，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民基本人权有哪些。我在北京、上海工作这么多年，有的在北京、上海纳税，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北京、上海人在一起受教育，为什么中国高考制度、升学制度要像所谓的北京、上海户籍的这种特权阶层倾斜。那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那些其他的，现在这种主流的政策走向，我们要大力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有一个背景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劳动力，连政府也想得非常明白，如果中国比如说有 7 亿农民都在农村的话，人人都得饿死，都靠农业来生活的话，活的跟大跃进的差不多。人均一亩多耕地、两亩耕地，你怎么能够容纳劳动力在那儿。你一个人，哪怕你是大学毕业生，你再大的本事，你们家的责任田就两亩，你能够折腾出什么效果来？中国的唯一道路，就是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往城市流动，像工业，像第三产业流动。然后把农村的土地能够变的更大，比如说你一个大学生回去，我家里有 50 亩地，这个可以搞搞农业了。

提问：我想政府可以让他们的家乡为他们的父母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在那边的工作环境，然后吸引父母回家。

郭宇宽：你要这样想的也很好，有的地方可以。这其实就是说进行小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你城市化别老是发展北京、上海的这些大城市，你重点发展二线城市，你把一些小城镇城市化了，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上海和北京生活成本如此之高，同时自然条件也不好，北京现在缺水，把河北的水都抽干了，为什么大家都要往北京来？为什么不能把河北发展的好一点？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的，我不给你批指标你就不能发展，你有很多的地，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河北那边 1000 多块钱一平米，这么便宜，为什么不去那儿发展？政府不给你批指标，你就发展不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所有的资源都必须向北京、上海来集中？明明已经不经济、不划算了。如果在飞机上看一些城市，都是一个大城市带动很多小的卫星城，一个城市群，中国为什么不行啊？在北京一定要修五环、六环，最后修八环，一直全部圈到中心。这是中国的权利结构决定的，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就造成了资源的分配要从中央向地方分散。等北京修成 50 环以后，基本上全中国就天下一片恐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都是空口白说，你说我们去发展中小城市，整个废话，这不想发展。那边地这么便宜，工业为什么不可以去投资？为什么不可以在那边搞房地产的？把那片都开发成别墅，不是很好嘛，但是不行。我们中央政府不能让你们随便发展。

提问：我想问一下，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改善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这个层次人自身素质水平的提高。在现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社会怎么做才能够把农民工的水平提高？但是该怎么做呢？

郭宇宽：我其实不同意这种话语，说这么大一个群体素质水平不是很高。

提问：我们现在看到的流动儿童，他们受到的教育的确没有当地的孩子受到的教育好，起码在硬件设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受到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在以后走上社会以后，这必然就成为他们的弱势，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政府、社会，包括我们应该做什么，改善这种现状？

郭宇宽：最根本的要改善这个现状，大家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觉得好像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讲政治，其实政治关乎到一个人的福利。为什么我前面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所有权利资源都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所有的地方办的最好的小学一定是领导干部的儿子所上学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史家胡同小学、景山学校，那教育资源太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一定是接触不到的，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教育，最后在为特权阶层服务。这个体制是怎么建立的？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手缔造的。你不打碎这个体制，如果说我们现在从内心多么希望教育公平，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的，在现在这个社会，短暂来说，5 年、10 年很难变化，但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所谓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农民之子”（北师大学生社团），我们现在是农民之子了，很关心农民，现在中国对农民的关注我觉得这几年来比前几年要改善很多。

比如说农业税全免了，这确实是一些福利，比前几年进步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又说了，一个边缘的中间的，而现在人口基数不比部分农民少了，中国的外地务工人员，就是以农民的身份到各地务工人员，至少有 4、5 亿这样的规模，很大一个群体。但是这样一个群体，比如说在北师大也没有一个“农民工之子”，我觉得以后到了一定时候，至少发展出一个“农民工之子”。那么我们的政策部门应该对应的专门对这个群体呼吁，专门对这个群体服务。我们的支教，现在很多支教还是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有的大学甚至说把大学生派到农村当什么村干部、村支书，这是很无聊的事情。你就在城市边上，眼皮子底下都不做。最简单的大学生支教，现在大学生就业这么难，北师大毕业的学生，国家拨款，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的工资，你就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对于国家来说这个钱也没有多少啊。

提问：现在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把民办打工子弟中学的学生转移到了公立学校当中，你有没有调查过这一部分的学生？

郭宇宽：这个主要还是媒体的宣传，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很难进正式的城市学校。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从幼儿园开始就能够在北京上城里的幼儿园。比如说北师大幼儿园，周围的农民工子弟也能来上，这一步都跟不上，到了小学，尤其是像我们调查的10岁左右的群体，他跟城市的孩子已经差别太大了。你可想而知，如果今天把你们几十个小孩转学，给你们受好教育，转学到北师大附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在这个班上一定会受到最大的歧视，这个社会的势利一定会影响到小孩。这些小孩普通话不标准，长的又土，习惯了没有城市人那么高雅，从小接触的文化环境也没有听过什么歌剧，看过什么的，见的世面也小。你可想而知在一个班上上课，小孩欺负小孩，那对小孩来说是最厉害的。最后这个小学会成为什么呢？我在纽约的时候听过这样的故事，纽约不是移民城市嘛，有很多移民聚集的地区，这一个小小学里面有一半是意大利的小孩，有一半是爱尔兰裔的小孩，结果小学你就分一大帮了，这一帮人打那一帮人，所以也很难。

提问：你的调查当中有包括这一部分人吗？比如由民办的转到公立的。

郭宇宽：我们在前期调研里面找到了几个样本，很少有在那样的学校里面能够坚持下来上课的，有的家长转学去，可能一两个月就呆不下来，就回来了。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学校呢？比如说北京有一个郊区的学校，因为城市规划，那一边已经招不到学校了，一个废弃的学校，政府就说，现在这个学校招不到学生了，我允许你招打工子弟学生。其实那样的话，又成为一个新的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农民工的小孩和农民工的小孩在一起，城里的小孩和城里的小孩在一起。

提问：我先说一下我刚才听的感受，你从打工子弟开始说起，比如说从小村庄长大之后，就进城务工，很大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到了现在，有了一代人之后，他们第二代人再来一些主流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或被边缘化，或教育、就业的不公平，导致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许多的社会矛盾。这时候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归宿于体制，把问题升层到体制那个层面了，但是体制这个层面，因为现在说既得利益集团嘛，你要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肯定要触动一批利益集团，你不改的话，这样下去又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你改的话，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又很难触动他嘛，你认为这个问题的结在哪里？

郭宇宽：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我能回答的，确实是很多我的同志们、朋友们，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都在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涉及的，比如说像巴黎的骚乱，人家法国人对这帮子移民是够仁义的，好吃、好喝、好福利，失业金给你，还给你安排房子住，安排你上学，这么好的伺候者，真是把你们各个都当爷，这帮人还要骚乱。而这个骚乱之前，对于生存在法国的那些知识分子，那儿政府的政治家都没有预感，这个东西不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但是事后的一些总结，很多想想，原来这个问题早已经存在了，一直是这样挤压很久了。那么我们今天中国之所以现在农民问题也是一个显学，人民大学都搞三农学院了，都搞出这个来了。

而对于农民工问题，绝大多数人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像你说的，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停留在怎么使社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有动力和压力机制，咱们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都能够解决。你想文革搞了这么多年，咱们中国人都能够走出来，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谢谢大家，我觉得时间基本差不多了。

提问：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如何通过你这样的方式，使现在这样的孩子更快的受益？或者如何通过你的调研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郭宇宽：就是把我们的调查结果，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传播。

提问：随时性的吗？

郭宇宽：每一年都会做。

提问：就是说做一段时间就会及时的把这个信息…？

郭宇宽：因为我们调查是一年做一次，我们设计问卷会拖很长时间，但是调查一年就是一次调查，然后最后一些项目分析出来，我们以后会更多的影响政策。

提问：这样的话，让他们所在的那个群体获得改善的周期性会不会太长了一点？

郭宇宽：肯定很长，而且我们最擅长的不是马上改变这个群体，最简单的，比如说我现在手里一共有 20 万课题费。我现在调查 1000 的小孩，我直接一个人发 200 块钱，马上就改善了。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所做的长远意义应该超过这些。谢谢！

主持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很感谢大家来听论坛，今天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郭宇宽：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这个群体，以后可以跟我们保持交流。

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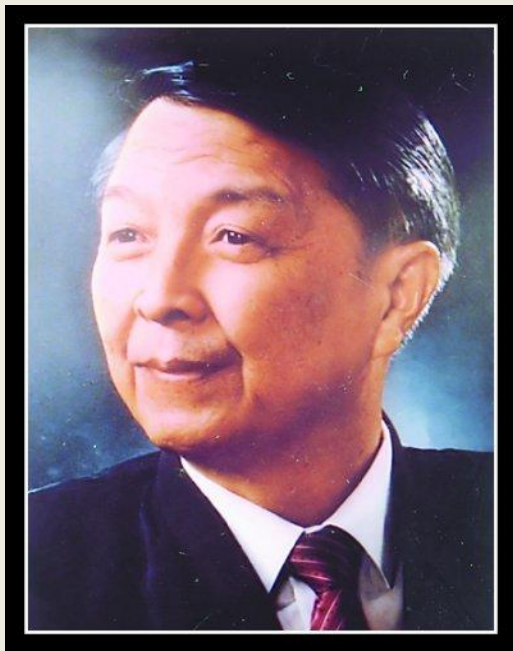
编者按：中共前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先生于2010年5月9日00:16逝世，以中共宣传部长之职而为人深切哀念，朱厚泽先生虽非空前却也绝后了。谨以此文遥寄我们的哀思，历史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给他很高的荣誉。

本文作者王天成，前北大法学院教师，著名宪政学者，现旅美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也是传知行研究所研究员。

■ “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纪念朱厚泽先生

王天成

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朱厚泽先生去世了，大陆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这一令人震惊的噩耗。但是，历史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给他很高的荣誉。



朱厚泽先生遗照（图片 from：腾讯网）

➤ 与朱先生的一次交谈

我在出国前曾见过朱厚泽先生一面。那是2003年岁末。畅销书《潜规则：中国官场的真实游戏》的作者、现任《炎黄春秋》主编的吴思先生，在三味书屋演讲。朱厚泽先生在场，我也在场。演讲结束后，包括吴思、张祖桦等先生在内的一部分人共进晚餐，我正好与朱厚泽先生坐在一起。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有人向朱厚泽先生介绍过我曾经坐过 5 年牢。但我肯定没有告诉朱先生我坐牢是因为担任他也许没有听说过的、1991 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宣传部长。与这位曾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长者坐在一起，自然就和他讨论起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欺骗性。他对我说：“最具欺骗性的不是那些不顾事实、一眼就能看破的谎言，而是参杂一些事实捏造一些事实、真话和假话混合在一起的宣传。”

那时候朱先生才 70 岁出头，显得相当年轻、精神。他敏捷的头脑、睿智的谈锋、坦荡的性格，深深地留在了我——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记忆中。

➤ 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

朱厚泽先生曾是西南边陲贵州的省委书记。1985 年 7 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书记胡耀邦将朱厚泽调往北京任中宣部部长，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替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他担任中宣部长后，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给思想文化界松绑，被认为是近 30 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当时我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也感受到阳春三月的清新）。1986 年底，地处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爆发学潮，并向北京等地蔓延。共产党内强硬派以此为契机，1987 年 2 月迫使思想开放、主张政治改革的胡耀邦下台。朱厚泽也被撤销中宣部长职务。在 1989 年的学潮中，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的朱厚泽支持与学生对话。“64”之后再次受到整肃，被迫退休。

朱厚泽先生 1987 年 7 月至 1989 年 6 月的主要事迹，在他去世后海外媒体的报道和一些人的评论中，已经被反复提到过了，我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复述一遍呢？

➤ 影响深远的两次政治清洗

我想说的是，在整个 80 年代，共产党高层有两次对温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现在，还波及未来。

第一次就是 1987 年 2 月对胡耀邦、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整肃。第二次是 1989 年 64 事件之后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清洗、整肃。经过两次清洗、整肃之后，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 年代留给 90 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缺失。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显的是，“64”的枪声响过之后，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已不成为派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改革派实际上也消失了。90 年代初，高层对于是否改革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上的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后来，经济改革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经济改革派也消失了。90 年代末，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代，如果用一个成语，也就是全面抱残守缺的时代。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像 80 年代一样，今天的共产党高层也依然存在派系斗争。但与 80 年代不同的是，政治派系的划分不能再以路线、政策的分歧为标准，将不同政治派系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利益、权力之争。这不是说 80 年代共产党高层派系不包含利益、权力之争，但那个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而今天剩下的，主要是赤裸裸的利益、权力，而不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

➤ 希望不在中南海

朱厚泽先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去世，的确是 80 年代残留的背影的消失。

据报道，今年 1 月 30 日，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 与友人谈话时，“对「中国道路」提出连串质疑：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另据报道，“有网友透露，朱厚泽曾对人说：‘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看到这句话，如果你感到绝望，那么，你应该绝望，因为你把希望都寄托在中南海了。只有你绝望了，才会有希望，因为希望不在中南海，而在中南海之外。

我认为，反思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模式”，以及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高层没有改革力量，是朱厚泽先生生前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告诫。

近年来，公民社会日趋活跃，社会又开始骚动起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副刊

编者按：本期副刊前两篇都和读书有关，郭玉闪与铅笔社商榷经济研究的重点，由晨立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推荐了两本好书。何正军的《这二十年》五年前发表在林江仙主编的《大风》杂志上，五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状况依然触目惊心，只怕再过“二十年”也未必会有改善，本期特地重刊此文，以示关注。《我的唐朝兄弟》上映已有数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所研究员任星辉将之解读成为一部政治伦理片，观点赖人寻味，相信不会令你失望。

■ 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研究？

——寄语铅笔社诸君

[郭玉闪](#)

作者按：本文是在一个内部邮件组偶然争吵出来的，和我争论的是[铅笔社](#)诸君；有感而发，写了有几万字，有些朋友认为，这些文字不应该只在内部邮件组发布，所以特为拣选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文，但语句之间难免保留一些当时对话痕迹，请阅者见谅。

作为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同道，铅笔社已经是国内比较坚定的一个群体了，做了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普及工作。当然，在他们前头的是张五常、薛兆丰。无论是观点、立意，甚至文字风格，薛兆丰的经济学都深受张五常影响，而铅笔社的经济学则深受薛兆丰影响。客观的说，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谱系是清楚存在的。

但是，从张五常这一系统出来的人，包括铅笔社，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从行事方式，却日趋怪异，标新立异的过头了。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比如禅宗，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呵佛斥祖”的狂妄；朱熹的理学，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道

学家的虚伪；王阳明的心学，开始也很好，后来也变成王学末流的空疏。

五常先生虽然有两个老师，阿尔钦与科斯，但他主要受的影响还是来自科斯，科斯是很好的，很严谨的，比如科斯不会说不要政府（1960年的社会成本最后几段说的很清楚），科斯也不会说经济学要在什么问题上都发言（他在90年初还有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呼吁经济学应当把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经济学上）。但是从科斯到张五常，再到中国的张五常后学，经济学就什么都讨论了，不管问题本身重不重要，变得只为刺激人们耳目，这当然就会日趋空疏，甚至狂妄。

问题重不重要，就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一般化。有些问题有趣，但是说穿了，不过是生活阅历的问题，只要老于人情世故，自然能懂。但总有一些问题，可以一般化从而为经济理论贡献原创。老实说，能为经济理论作原创贡献实在太难了。要大刀难，造大刀更难。张五常当然是有原创性贡献的，而且很有天分，就像杨小凯评论过的“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但在张五常之后，国内这些人包括周其仁在内，客观的说，都只是耍大刀的，都还谈不上为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但是，即使是要大刀，也有重要性区分。如果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问题上动脑筋，那只是小把戏，即使有经济启蒙意义。问题紧不紧要，当然要和中国现实相关联。所以至今为什么国内没有人在“耍大刀上”还能超越周其仁，除了学理能力的区别外，最重要的还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或者说，在问题的选择上。举凡事关民生的大问题，有几个像他那样勤勤恳恳实地调查然后给出精确的解释？

所以，周其仁被大家这么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关心的是大家都关心并且与中国休戚相关的重要问题，然后他还能做出非常透彻的解释，这样既关心中国现实又如此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会被中国社会重视。相反，即使你经济学功夫了得，却整天只会整一些稀奇古怪的小问题，别人自然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了。而且，这是公平的。你不关心社会，社会凭什么

关心你？扯远了说，2000年后为什么经济学家越来越不为社会待见，总体声誉越变越差，除了官僚群体已经在全球化中成熟起来不需要他们当导师而只需要他们当枪手及马仔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离社会越来越远，你抛弃了社会，社会自然也就抛弃你了。这也是公平的。

着重“一般化”的另一个含义是不用特殊理论来解释经济现实。但是要小心，如果把经济解释当做人类行为的终极解释，那就不是一般化，而是狂妄了。德姆塞茨（H.Demsetz）在他2008年新书《from economic man to economic system》的第一章

“where economic man dwells”里面专门讲解了为何经济学需要“经济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按经济动机趋利避害的人）这样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去解释一个谜，一个在经济学成型为一门成熟的社会学科的150年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想去解决的一个谜，也就是哈耶克用“自发秩序”部分形容的“社会作为整体如何在没有人有意识管理或者控制的情况下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或者说，一个极度离散的、去中心化的社会里资源为何能得以有效的配置。

“经济人”的分析方法是了解释这个特地目标（problems of marketplace）而创设的一个工具，相应的，其他的社会科学也有特地目标要去解释因而也对人性做了不同于经济学角度的假设或者抽象。但没有一门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已经敢自称对人做了全面的、精确的描述，从而已经是关于人以及社会的全部真理。

因此，我们既不能拿人的丰富性来否定经济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不能拿经济人的解释方法来取代人的复杂性。前者是社会通常容易产生的对经济学的误解，后者则是经济学家的狂妄。这种狂妄，在我看来，是需要张五常后学包括铅笔社在内警惕的。如果一方面只是在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打转、玩弄智力游戏，另一方面，又把经济学当做全部真理，肯定既不会有什么大成就，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抱负的话，还是得真下功夫去找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来调

研并试图解决，如周其仁所实践的那样。就像张五常也说过的，重要的或者最难的是对约束条件的调查和了解，因为解释复杂世界的理论可以简单，但是世界毕竟是复杂的。

世界是复杂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是多方面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是复杂多变的。就如秦晖所说的，由于人性的局限，人难免自私，因此自由主义可以成立，同时，人难免怯懦，所以社会主义可以成立；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多少“不自由毋宁死”的崇高者，而在于上述人性局限颠扑不破，广义的社会主义之不灭，也并非因为人可以变得多崇高，而是因为人无法脱离渺小。社会最终的形态总要有所有这些不同价值观凑合而成，自由主义者要坚持的无非是在一些权利的私域里，任何其他人或者公共（总体）价值都不能予以强制性的强迫，这些私域里的权利或者价值是绝对的，是不需要任何解释以及功利主义的计算。在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国家里，对这个私域权利的保护是绝对的。

但是，显然，以社会成员之复杂，以人性局限之多，即便在这个理想国家里，这个私域里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权）也必然是不止于财产权的。如果有人只想在人权这个私域里放入财产权，那么只要他还信奉自由主义，对这类人来说，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退出任何要在人权私域里放入财产权之外其他人权的社会。因为假如他还想留在这个社会，并试图用他的（人权=财产权）来规范社会，那就意味着，要把其他人权从私域的绝对保护赶出去，并放入社会里让其他人来决定是否要保护，这就必然意味着强迫与羞辱。

所以，说到底，经济理论的一般化并不意味着终极解释并规范社会，而是应该像科斯老人家提醒的，最好集中在经济领域本身，像德姆塞茨说的，集中用于解释市场配置资源之谜。如果要把经济理论一般化到所有人类方面，一般化到人性规定上，那么，这些抱着这种狂妄想法的人们，只要他们还是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社会再增加更多的强制），那么确实只有退出这个社会了。反之，只要不想退出

社会，而是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社会贡献一些福祉，那还是按科斯/德姆塞茨的意见来，不要随意扩大经济解释的一般性，给经济研究设个边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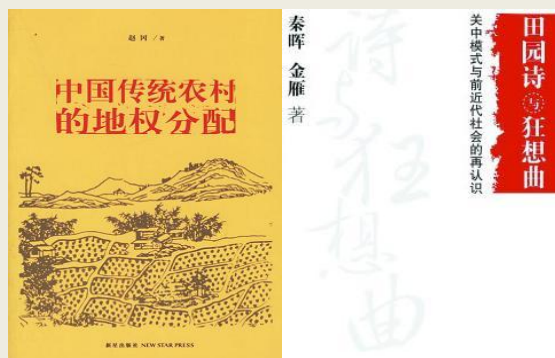
这些道理说起来复杂，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在中国的语境下，学周其仁就可以了。坚持这些道理并不容易，因为掌握一种理性很容易给人们带来智力上的狂欢，从而开始小瞧社会之复杂，小瞧他人之感受。铅笔社诸君要想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还是需要多一些谦逊的精神，同时多一些捕捉重要问题的意识。其实，哪怕只关心财产权在中国的缺失，或者经济自由度在中国的完整，那也应该首先关心那些最缺乏财产权或者经济自由权利的群体，这些群体并不仅仅是那些真正的企业家，而是农民，工人等。一般来说，他们的悲惨故事是从丧失经济权利开始，但最后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他们什么人权也没有。在中国，政治与经济，财产权与其他人权完全是不可分割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哪一天铅笔社真做到了理性而不狂妄，关注重要社会问题，知道自己智慧的边界，那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个“灰不溜秋”的铅笔头了。

好书推荐——《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和《田园诗与狂想曲》

[由晨立](#)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问题颇多。而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中，土地问题是极重要的一个。而围绕土地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不仅应当关注当下，也应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古至今土地制度的变迁。的确，我们今天应当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多重视角来审视国家权力、法律与制度、土地产权以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等各种热点问题。然而，梳理历久以来中国社会土地制度发展变迁的进程，从而认清其发展脉络，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当下的土地问题研究，谈理论的多，摆事实的少。无论是那一派阵营，往往口号触目皆是，而实证研究却稀见而粗糙。更何况，在相关的问题上，我们脑中仍然残留着众多常识性的错误。

比如，直到今天，关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我们的文字还充斥着“两千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余毒”、“土地兼并恶化”和“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等等缺乏基本常识和历史知识的意识形态。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对上述歪曲事实真相的言说的嘲笑、批判、反抗。然而，所有这些评论和研究往往人云亦云，就像张五常说的，当年他在经济学名著中利用脚注追索案例，居然发现众多作者堂而皇之引用多年并成功使其成为经典案例的故事，往往是当初某书作者一个不经意的比方或者“听说”。

从上述意义上讲，我向大家推荐两本书——赵冈先生的《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和秦晖、金雁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

对于“封建社会”一词，或许历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作为“封地建国”一词的缩写，中国自秦开始，就早已不再是西方文化中（特别是马克思）所谓的封建社会。而赵冈先生也指出，“秦汉以后出现的地主，不是皇帝所‘封’或政府所‘建’，被称为‘封建地主制’是很不恰当的名称”。

而关于解放前的土改政策，今天对其评价已经从当初的“肯定、赞扬”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弯。但是，对其目的、过程的批判却多是道听途说和各地故事的拼凑。对于这一不足，上述两书弥补了案例研究的缺失与不足。秦晖先生经过对关中地区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所存相关卷宗的考察和统计分析，证实所谓“关中无地主”说法的真实性，并将此特点命名为“关中模式”，并以此与“太湖模式”相比较。而他在书中也不忘指出：“研究土改史的学者也许都知道，土改时我国许多地区都出现过‘地方特殊论’。北方一些地区认为本地不如南方发达，情况特殊，故地主少；南方一些地区认为北方土地多，地主都在那里，本地地主情况特殊，故不能与北方并论；甘肃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贫瘠，故地主多占地无益，是为特殊；浙江一些地区认为本地土地特肥沃，人多地贵之而不愿卖，富人买地难，故地主奇少是为特殊，如此等等。土改时对这些‘本地特殊论’大多是从政治上进行批评而不是从实证上予以澄清，实际上并不能驳倒这些说法。而‘特殊’者一多，便令人疑其多少带有某些普遍性了。”

而赵冈先生的研究更是将上述问题拓展到全国范围。他利用各地保存下来的鱼鳞图册、黄册、实征册、编审册、置产册等资料，利用现代经济统计方法加以分析，结论认为“北宋以来农村的地权分配确有明显变化：地权分配的平均值大幅下降……证明‘不断集中论’及‘无限集中论’都不能成立。无地农户之比重未见增加，大地主却逐渐消失，也证明‘永远的兼

并’不是事实”。而对于前述秦晖所谓的两种模式的差异，赵冈则认为差异主要来自“族产”、“义庄”的错误分类与“永佃制”造成的扭曲。而如果将上述扭曲消除，则所谓的差异也自然消失。

两位著者的论证各有特色，但都蕴含着学者特有的沉静与平和。秦晖先生不断向概念和常识提出追问与反思，而赵冈先生则娓娓道来、柔而愈刚。是的，如果我们无法做出严谨的案例研究，至少应当向扎实的实证工作致敬。如赵冈先生在书中前言所写：“我们陷入……理论上的误区已经太深太久。要想脱离这个误区，不能以同样抽象的理论来反证，而要举出实证资料，具体说明。”

■ 这二十年

何正军

作者按：五年前我从北京到福州千里单骑，只为磨砺性情。孰料一路与贩夫苦役为伍，也算是再一次亲历了民间疾苦，听到、遇到不少故事。最后形成的这篇文章，算是此行的意外之财，又有友人不弃浅陋，将其发表于《大风》。五年后重读，字里行间不再是某人的生活，而是当前民工群体命运的写照。

从我记事起，我的父辈就开始终年奔波于城乡，以苦力换取城市的稻粱滋补一家老小。直到长大成人，我的父亲还像二十年前一样奔走，除了白发渐多，生活也没见多大好转。而我跟我绝大多数的同辈也都循着父辈的足迹背井离乡，雄心万丈地要在城市里讨生活。回首又是十年，才发现城市依然不是我们的城市。

人生还有几个二十年？漂泊还要几个二十年？



何正军 He Zhengjun

1984 年春节，当他扑在父母怀里哭诉着第一次打工遭遇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二十年后还会打工；而今妻女又随同来到城市，他仍然没有想过这工还要打到哪个年月……

二十年，正是数以亿计的他和他的家庭在风雨飘摇的打工生涯中创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通过打工来消灭打工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对中国这条打工路的前二十年做个系统的考察。

回望来路，各年龄层队伍的生存方式正在逐渐分化……

➤ 知命之年：回家了

张大贵把手里捧着的像油炸过一样的毯子端详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它丢到垃圾桶了，这样一来，他的行李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外别无他物，偌大的旅行包显得空空荡荡。他提着行李有些依恋地环顾自己近三个月来的住所，这是一栋尚未完工的大楼底层大厅，地上还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草席，厅里没有一个人，工友们都上工地干活了。

还有四个多月才过年，他本来准备年底才回家，回去后就不再出来了，因为女儿出嫁和儿子上大学所欠下的两万多元债务，今年终于可以“抹平”了。只要没有债务的压力，他是不愿意再跑出来风餐露宿吃这口“下贱饭”的。

但是就在昨天，突然接到家里的来电，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身体情况很不好，要他立即回家以备不测。实际上他很明白，父亲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年老了，总是希望身边有个儿子照顾着心里踏实些，何况他上次离家已经三年没有回去了，父母很想念他，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催促他早点回去。

虽然工地还没有完工，但他接了电话后还是决定马上回家，因为等到年底春运的时候，“人多车费又贵，不如现在轻轻松松地走”。况且这三年来也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人，特别是妻子，二十多年来一个人种着五个人的庄稼，“苦的跟牛一样”。几年未见，想来她“肯定老了一大截”。

于是张大贵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就这样提前四个月结束了。

他提着空空的行囊，上了去广州火车站的公交车，他要赶下午去成都的火车。

在他的打工生活中，广州火车站是最能引起回忆的地方之一。1994 年，经同乡的介绍，他和堂弟两人前往杭州附近的一个沙石厂打工。当他们到达沙石厂后，同乡告诉他，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另一个不得不另想办法，他考虑到堂弟腿脚不方便，决定让堂弟留

下。春节在家听人说广州找个力气活还比较容易，于是他向同乡借了 300 元路费只身到广州找几位堂兄弟。

当他走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的时候，迎面几个小青年叼着烟围了上来，直接就开始搜他的口袋。他毕竟闯荡过几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主动跟对方交涉：“你们给我留几块钱坐车吧。”小青年不吃这一套，恶狠狠地说：“你坐车关我们什么事！”

强盗哪有逻辑？！在那个年头，遇到这种事他只有任其摆布。

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多块钱，被流氓扫荡殆尽，他只能一边问路一边步行到天河体育中心附近的一个工地去找几位堂兄弟。四个小时后，终于找到那个工地，这时工人们早已睡下了。他奋力地敲打着铁门，终于出来一名保安问找谁，他说要找四川的某某某，保安告诉他这里的四川人都走了，让他去别处找。原来几位堂兄弟在几天前就去了另一个工地，当时信息不灵通，他无从了解情况。

此时他早已精疲力竭且身无分文，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人，谈何容易？于是他再次敲开大门打听是不是有贵州人在，据说几位堂兄弟跟几个贵州人一起干过工。幸好，工棚里还住着那帮贵州人，贵州人还算热情，留他住下了，后来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堂兄弟们已经去了湛江。

在更早的时候，他也去过湛江，那是他刚刚背井离乡奔向城市的头两年。一个远房亲戚带话回来，说在湛江可以找到活干。怀着对城市的梦想，他和几个同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那个远房亲戚在一个公交公司打杂工，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堆杂物的小棚子，他们就暂时栖身在此。那间棚子夏天像蒸笼一样闷热，下雨的时候即使外面雨停了，屋里也还会滴答滴答地漏水，有时候他们就半夜偷偷地钻到公交车里睡，天亮前又偷偷地从车里钻出来——不能被公交公司的人发现，否则就会挨打。夏天还好解决，只要避开城管

和警察，在街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睡上一夜，但是南方的冬天也会寒冷，这个季节他们就只能几个人挤在棚子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外面所受的一切委屈和困苦，他一般都不会去回想，因为跟他一起的所有打工者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关心的只是如何找到活干，将儿女好好地培养成人，还有为父母养老送终。为了这个目的，二十多年来不停地更换打工的地点和工种，按他的话说就是“跑了大半个中国”、“只要你说得出名字的力气活都干过”。因此每次回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物件带回去，最普通的是扳手、老虎钳、电工刀具、电线、铁锹、甚至二号大锤，偶尔还会有给人搬家时主人送的半新的电饭锅。

张大贵“如实记得”打工第一年，春节回家带了 3 斤香蕉，全家老少、左邻右舍都来围着看稀奇，那时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城市的新鲜事，比如“几十个轮子的汽车”、“城里人的早饭不吃‘帽儿头’干饭，要喝牛奶”，“麻雀牌”一类的赌博等等。正是他带回来的香蕉和故事，让一批又一批的乡里人走出乡关，奔向城市。

这次回家，他还想了结一桩拖了好几年的事。2000 年下半年和 2001 年全年，他跟随一个亲戚去西安的一家公司“架塔”（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架设通讯塔），一年半的工资，至今分文未得，按他的计算，这个数额至少在一万元左右。

在他看来，架塔是除了“钻碳洞子”之外最危险的工作，跟他们一起去的一个同乡，就从几十米高的塔上掉了下去，“从我面前一股风就下去了，脑壳都找不到”这一幕至今让他心惊胆寒。这活儿除了危险还十分辛苦，一年半里，北到内蒙古，南到福建，马不停蹄地架塔、转移、再架塔。到年底终于把最后一个塔架设完成，领队的亲戚给每人发了几百块钱作路费，让他们直接乘车回四川，他到西安代大家领工资。

让张大贵没有想到的是，亲戚回来告诉大家工资没有拿到，因为公司已经放假了，找不到人。这个结

果让所有一起打工的同乡感到极为愤慨，一致认为工资是被那亲戚独吞了，因为他的口碑向来就不好。可亲戚赌咒发誓没有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而且2002年初，他还邀张大贵一起到西安去过，最终因为“单据不齐全”，不但没有拿到工资，反而变卖了亲戚的手机两人才回到家。

如今四年过去了，那笔“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换来”的工资还是没有着落，不知张大贵这次回去会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大贵说，他做了一辈子下贱人，没有过过一天舒坦日子，再也不想漂泊了。回去跟“老太婆”一起种种地，刨点零花钱，侍候父母，尽一尽做儿子的孝。

➤ 不惑之年：回家太奢侈

“横山白泥厂”距湛江40余公里，厂里40多名工人，有一半是四川人，其余是河南和广西人。因为四川人“敢拼命”，所以最苦最累的活一般都由四川人来干，当然拿到的工钱也要高一些。

陈四清就是这批四川人中来的最早的一个，四年来，经过他的介绍，一些家乡的亲朋好友也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好几个都是夫妻一起过来，甚至有的还带着小孩。他们形成一个小小的圈子，一般很少跟同厂的外地人交往。

陈四清经常会在连续干了70几个小时后，煮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呼哧呼哧地往肚里吞。如果正好有几个同乡在旁边，他会一边吃一边发牢骚，抱怨最多的是如“看家狗”一般的几个工头老是无中生有找他的茬，“早就受够了这窝囊气，把老子惹毛了，好好生生捶他一顿！”陈四清又发了一回誓，这时，同乡都会笑话他：“都把你惹毛了好多回了，没看见你捶他！”陈四清还是嘴硬：“大不了不干了，早就想走了，哪儿还找不到个活干？”

但是四年了都没有走，那是因为他不敢走，私下他也在盘算：两个儿子上高中，一年就要一万多，大儿子明年就要高考，如果上了大学，花钱更多。就算不抽烟不喝酒，一年下来也就攒一万块钱，家里是没有指望的，妻子种庄稼累死累活也只够家里开销。挣钱的时间他一天都耽搁不起。

不久前陈四清咬着牙买了一部二手手机，因为他想让儿子随时可以跟他通上话，给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儿子很少打电话过来，打来也不外是要钱，偶尔也会问他今年春节回不回家，这时他就要跟两个儿子算一笔帐：“回来一趟光来去车费就要一千多，那么多亲戚，每户去拜个年，又要不少钱，一来一去至少要一个月，少一个月就少一千多块钱，够你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儿子听了默然不语。挂了电话陈四清心里也很难受：“哪个不想家啊？我走的时候他两兄弟还是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老大明年就要考大学了，等他考上了我一定回去。”

在回家的问题上，同乡们都抱着与陈四清相同的态度，这二十多人里，近三年回过家的只有5人。

何少云去年春节只身回了趟家，把妻子留在了水泥厂。老母亲叫他回去是因为父亲病得厉害，她们已经无力再照管两个孩子。

老父亲得了心肺肿大的慢性病，心和肺不停地折磨，让他痛苦不堪。乡卫生院的医生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个病，拿到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只有等死，没人能出得起这个钱。”老父亲要求停止治疗，“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早些死了好睡个安稳瞌睡。”但是母亲没有接受他的要求，隔三岔五就会背上几十斤粮食上街卖了再买些药回去，哪怕都是些消炎止痛的药。谁都知道这不是在治病，而是在尽一种责任。

何少云跟父母商量：这些年打工，手里还有万把块余钱，把父亲送城里大医院治疗，现在医疗很发达，没有治不了的病。母亲一听就急了：他死就让他死，

你那点钱顶啥用？房子卖了都不够，不要让他连累后人。父亲也不同意治疗，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你把我两个孙子养好就行了。我活了七八十年，啥时死不是死？

何少云快七十了的母亲虽然身板还硬朗，但是要照顾病人，庄稼地和家务活干起来就显得很吃力。她经营的何少云的几亩水田，前年就送给了邻居，去年邻居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现在那些水田是谁在耕种都不清楚。“几亩田值个什么钱？”何少云也懒得管它。何少云说他“考虑了三天三夜”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不再坚持要给父亲治疗。但是他必须将一对儿女带走，带到他打工的地方去上学。

正月初七，何少云带着儿女买了三张高价车票，花了近两千块钱。走的时候老母亲送了很远，殷殷地跟他说：过年了就带两个孩子回来吧。何少云顿时“喉咙管都硬了”，只应了一声，转过脸去泪水就滚了下来。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父亲过世，他们一家就不知要到哪年才会回来。

现在两个孩子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虽然不是太贵，但花销也要比在家上学大的多，还得要按时给父母寄钱回去，夫妻俩只能更加节约。

以前男人们爱聚在一起打牌赌钱，现在还是赌，但是改赌钱为赌花生米了；以前抽纸烟，几块钱一盒，现在抽当地农民抽的水烟袋；以前每天都会抽点时间上街买新鲜蔬菜和猪肉，偶尔还有鱼，现在自己动手腌制咸菜，几天买一次肉；以前喝瓶装酒，现在喝用可乐瓶装的散装米酒；以前直接用煤气做饭，现在偷偷用电炉子，因为用电不花钱；以前洗发用洗发水，现在用洗衣粉。

陈四清、何少云的打工生活过得越来越窘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算是作牛作马也要把子女供上大学，卖力气这口饭不好吃。

➤ 而立之年：忘记回家

高登街在海口不锈钢门窗制作行业里是鼎鼎有名的，整条街上鳞次栉比的加工门市聚集了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从业人员。

张吉祥在这条街上开门市已经有 5 年了，他的门市跟其他所有门市一样：十几平米的房间既是产品展示场所也是加工厂。老板都是这一行的老手，从学徒干起，后来掌握制作技术和行业情况后就自立门户，再带几个年轻的学徒，一边在免费传授技术一边也义务为老板服务。

像张吉祥这样的打工者挣钱的方式和速度已经远非其他靠力气吃饭的打工者可比，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但是张吉祥近两年时常哀叹自己时运不济，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现在都少有问津，原来带的两个学徒也已经离开这里另找出路去了。

高登街上大部分门市也都跟张吉祥一样，生意日渐萎缩。经过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几个湖北佬把高登街搞烂了。”因为两家湖北人开的门市这两年一直在打价格战，门口的价格牌一天一个价、一家比一家低。整条街都只能跟着降价，行业越来越透明，赚钱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

没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张吉祥都在“牌桌子”上过，在这里不乏“赌友”——除了大量闲着的门市老板和学徒外，几乎每家还有一个专职带孩子做家务的家庭主妇。久而久之，高登街的见面语成了：“走，打麻将！”或“斗地主！”。

光今年上半年，张吉祥夫妇在赌桌上流失的钱就有四五千块，这让他心痛不已：“给两个孩子交学琴的几百块学费也没有这么痛快过。”张吉祥几次决心要“戒赌”，但往往又会受邀去通宵鏖战。

不管有没有生意，门市还是要照常营业，因为场

地太小，每天都要把样品门窗摆在门外，晚上关门时再收进来。这一摆一收，麻烦自己不说，还会引起城管管制，城管隔三差五就会来，来一次罚一次款，一百、两百元不等，罚完了还是得继续摆。有时房东会提前得到消息通告他们城管什么时候会来检查，让他们提前把门窗藏好。

每每看着冷清的门市，张吉祥就会感慨：九几年的时候钱好挣，没几个人懂这个行业，价格随便定。那个时候开店（门市）的几个老乡现在都有一百多万了。可惜当时胆子太小，觉得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工钱就不错了，现在开又赚不到钱了，这都是命啊。

虽然张吉祥常常抱怨自己“命不好”，但是他也在积极寻找出路。这几天他看上一个地段，虽然偏僻一些，但是那里有个新开的陶瓷市场。他认为陶瓷市场可以带起这条街的人气，并且也都跟建筑材料相关。但这只是个预想，谁也不知道将来怎样，如果搬过去可能冒很大的风险。张吉祥比较头痛这个问题，他打电话给父母征求意见，父母却建议他们回老家县城做个小生意稳妥些，这样离家也近。张吉祥又跟妻子商量，都觉得回去可能更没前途，还不如继续留在这里另想办法，就连六岁的女儿也表示不愿意回老家去。

张吉祥决定租下陶瓷市场旁边一个新门面。面积有现在的两倍，而且还带一间住房和厨房。跟房东喝了几次茶后，月租金降到2200元，签5年合同，第一次付款5万。签下合同后，张吉祥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新家，两个孩子高兴地搂着爸爸要买一架儿童床。也难怪她们那么高兴，原来一家四口住的地方就在门市内的“空中阁楼”，这个被张吉祥称作“包厢”的阁楼是他亲手用钢筋焊接制作的，仅够睡觉用。厨房则设在公共走廊上，炒菜的时候还要避让行人。

张吉祥也在考虑要买一套八九十平米的房子，让孩子们住的舒适一些。但是外界所传言的几十万财富都还属于债权，去年经人介绍承包了四栋居民楼防盗门窗的制作安装工程，十八万工程款，现在还没有收上来。张吉祥每天都打电话过去问，对方都要说老板

不在，结不了款。他倒不担心这款收不到，毕竟对方是正规的公司。让他气愤的是有不少欠款已经确定收不回来了，每次把电话打过去，对方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从来不认识张吉祥这个人。有一次张吉祥偶然在街上发现一个欠他钱的包工头，他生拉活拽把包工头带到门市，让他还钱，不还就不让走。包工头用海南方言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叫朋友送钱过来。张吉祥虽然在海南打了不下十年工，但是本地语言还是听不懂，他没有看出什么，信以为真。一会儿，包工头的朋友就来了一大群，个个手提棍棒，把门市团团围住。张吉祥赶紧让妻子把两个孩子从后门带走，打110报警。几分钟后110到场，平息了事态。虽然事情没有闹大，但是那笔欠款是收不回来了。

张吉祥的打算是：“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房子就先不买了，新租的房子正好有一个房间，住着也不错。”

再有几天就要搬过去了，今天地税局又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有8个月没有交税了，再交就要罚款。张吉祥也不理会，反正过两天搬到新地方又要重新登记，现在交“就浪费了”。周末张吉祥都要骑摩托送女儿去学校学跳舞，这周他让女儿不要去了，过几天就要到新学校去上学。这几天他都忙着挨家挨户比较不锈钢原材料的优劣，他准备再做一批样品门窗。因为新地方面积大，要安排得排场些，这样顾客一看就觉得“有实力”。当然这又需要不少成本，按他的话说就是“老本都填进去了，要是生意还做不下去，大不了老婆孩子送回老家，我重新给人打工。”

尽管生意不好做，钱不好挣，但生活还是照常。每天吃过晚饭张吉祥都会带着一家四口出去逛逛街，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都会给予满足，遇到好电影也不会错过，有时高兴了干脆关上门，去公园玩或到海边游泳。张吉祥说他们一家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反而乡村生活的寂寥让他们很不适应，四年前的春节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老家，没住几天就回海南了。现在出生在海口的二女儿已经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爷爷奶奶。

早在上半年，妻子就开始给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打电话，相约明年春节都回老家聚一聚。但是这次搬家花了太多的钱，夫妻俩商量是不是今年也就不回去了，把父母接到海南来过年。

虽然一直在辛勤地打拼，但张吉祥说他没有什么高的要求，“只要有一套小房子，开个四个轮的车就满足了。”

➤ 弱冠之年：四海为家

“把胳膊抬高一点往下敲，要省力的多。”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正在建设的“海南炼化”工地上，阿彪给新来的小东指点用榔头的技巧。他们进行的是水电安装工程。

阿彪 23 岁，“在海南转了 5 年”，俨然已经成为施工的老手，所以包工头让他带领、指挥这支 30 多人的临时队伍。

半年前阿彪还在琼海一处新建住宅小区施工时，专事包工头的老乡——大勇从海口打来电话，说新近承包了“海南炼化”的水电安装工程，需要人手，要阿彪五天内找 30 个人。

阿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凑不够人数，于是建议大勇把工资从每天 40 元提高到每天 45 元，但是遭到大勇的否决。最后不得不亲戚带亲戚、朋友找朋友，以至于像小东这样的新手都可以加入。五天后，30 多人从海南的四面八方汇聚到“海南炼化”工地。

安装队大多都是年轻人，在工作中时常会用他们的“黑话”商议事情：“今晚奔向 2008！”

“你又想做贡献啦？”

“少废话！去不去？”

“又要我掏钱？”

“各管各的！”

“好，吃完饭你们等我。”

下午六点下班，有专车来接安装队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工棚。工棚距工地四公里，居住的都是“海南炼化”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台风“达维”席卷海南之前，这里住着七八百人，现在只有四百多，好几个坍塌的棚子正在重建。

阿彪和他的安装队住在一个 15 米长的棚子里，左右上下四个“大通铺”，仅以蚊帐为界。门口有两个用木板严严实实钉起来的像柜子一样的床，分别住着一对夫妻。两个女人负责为安装队做饭，都是阿彪老家的人。

几个约好出去玩的队友迅速吃完饭，开始冲凉打粉。在工地上大家都戴安全帽、穿工装，弄得灰头土脸。现在穿上都市里流行的时髦衣服，梳出最酷的造型，脸上也没忘了抹点“大宝”，个个精气神十足地出发了。

镇上永远都有没完没了的灯红酒绿，台球、卡拉 OK、烧烤、酒吧、蹦迪等等娱乐应有尽有。阿彪们来到这里就兴奋起来，先选定一家卡拉 OK 唱歌喝酒。这是一个显示派头的难得机会，大家往沙发里一靠，手一挥：“小妹，过来！”服务员盈盈而来，“把曲目单拿过来，另外每人一瓶啤酒，你数数多少人！”阿彪神情有些高傲。

虽然手机铃声都是周杰伦、孙燕姿的歌，但是《九月九的酒》、《铁窗泪》、《思念》等老歌仍然是保留曲目。实际上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五音不是很全，但这“也就是发泄一下而已”，所以他们的演唱总是不着调地山呼海叫，这往往会引起其他客人的不满。

一边唱歌一边还要喝酒，大家举杯第一个要敬的是包工头大勇，诸如“跟大勇兄一起开创未来”的话，平时是难得一说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两个月后“海南炼化”工程完工，30 个人就得到其他地方另找出路。但是在喝酒的时候，这些场面话还是要说的体面一些，毕竟大勇给了他们大半年的工作机会。

“2008”才是他们真正的主题。在“卖人肉跟卖白菜”一样的环境里，“2008”是较为高档的一种，一次花费就要好几百。阿彪说他一个月一千六七的工资全都喝酒、玩光了，所以这种地方也不是常来。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会告诉你：“女人太可恶了。”故事是这样：两年前他认识一个当地女孩，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一年后分手。至于为何分手，阿彪不愿详谈，只说：“女人太现实了，现实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反正他是被深深刺痛了，从此变得玩世不恭。曾经有人劝他回老家找一个，被他断然否决：“老家的女孩也不简单，全部明码标价，两万块一个，要我回趟家我还要借路费呢。”更何况他觉得这里认识女孩更方便，喝茶可以认识，别人介绍可以认识，甚至去按摩都可以认识。

阿彪现在觉得自己这种人四海为家，哪里能生存就到哪里，要正经八百找个女朋友好像不太合适。

就在阿彪给小东指点用榔头的技巧的同时，深圳山厦工业区，一个名叫海霞的20岁女孩正望着林立的工厂发呆。

就在昨天上午10点，她还在湛江一家蛋糕店做蛋糕。突然老板跟自己的女儿吵起架来，海霞是个热心肠的女孩，她上前去劝解，老板女儿劈头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快滚！这里不要你了！”海霞又是个性极强的女孩，她放下手中没有做完的蛋糕，摔门而去。

走后不久，老板给她打电话千般挽留，她去意已决，直言告诉老板：“你女儿年龄比我还大，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怎么留下？如果你真看的起我的话，就把我的工资送过来。”还好，老板果然开着车给她送了三百块钱过来。

突然失业，并没让海霞感到多惶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三年来，最短的工作只干了八天，最长也不到一年。她很注重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和能否学到东西。往往辞工都是因为“跟其他工友无法沟通，她们老是欺负人。”但是有时也能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她

记得一个师傅曾经告诉她：“在外打工，大家都应该讲义气，互相帮助。”她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

当天晚上她就到了深圳，先找个旅馆住下，“路都是闯出来的”，她有足够的胆量四处闯荡。

可是当她看到一片接着一片的工厂时，有些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她也有精明老到之处，她跟着其他找工作的人挨家工厂去问，对比底薪是480还是500；上班时间是8小时还是9小时；加班一般都加几个小时；加班费是每小时3.87元还是3.60元；一日三餐，每餐都有什么菜；工人宿舍是几个人合住；是否有节假日……一天走下来，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了，还是没有定哪一家比较合适。她算了一下，有的底薪高，有的加班费高，其实平均下来每家都差不多，月工资能有一千多一点。但是也确定了两类工厂不加入，一类是做五金的，那个太累，也很脏；一类是印刷厂，因为曾经目睹一个工友两个手指头被机器截断的情景，现在还有些恐惧。

她想了想：“或者我还是应该找一找西饼店做蛋糕去。”

► 纯真童年：家在画里

三年级二班的绘画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兴平有些茫然地看看四周的同学，老师见他似乎没有听懂她的话，于是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请你画出你最想画的人”。兴平左思右想，直到下课也没有想出来究竟要画谁，只得把这个作业带回家。

兴平跟随父母来到湛江后，就在一家小规模的材料厂安住下来。下午放学后，他看着整天轰鸣的机器和忙碌的工人，悻悻地回到那间简陋的宿舍。他的隔壁还有两个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来的伙伴，分别是上一年级的丽丽和上幼儿园的“胖冬瓜”。

写作业的时间通常都会放在晚上，如果白天写了“晚上就没事干了”。每次被父母逼着在天黑之前写完作业后，吃完晚饭就只能上床睡觉，又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以前厂里还有一台电视机，三个孩子会在大人的带领下去看看节目，但是如果“爸爸不去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的。”因为“那是老板的电视。”后来电视也坏了，一直没人去管它，兴平和两个伙伴常常轮流去远远地窥探，回来都是摇头：“还没修”，久了也就不再指望了。

兴平和“胖冬瓜”都很喜欢丽丽那支粉红色的小气球，趁丽丽不注意，他们就会抢过去往空中拍，大喊大叫惹丽丽生气，果然每次丽丽都会哇哇大哭，兴平、胖冬瓜又笑呵呵地双手把气球送到丽丽手上，丽丽拿到气球又破涕为笑。这样的游戏总要没完没了地玩，偶尔还有一个广西的小朋友远远地跟他们炫耀：“我有直升飞机”，说着把手上的一架玩具直升飞机在空中翻腾。三个人都停下游戏，眼巴巴地看着那小朋友，“胖冬瓜”翻着白眼，双手叉腰不屑地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才不跟你玩呢。”兴平猛地冲过去，将广西小朋友手上的直升飞机夺过来，放到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那小朋友急得大哭起来，三个人在一边手舞足蹈地嘲笑他。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了，满身的汗水和木屑。爸爸见几个孩子还在玩，对兴平大吼一声：“怎么还没做饭？”兴平一下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腮，撅嘴白了爸爸一眼：“我就不做，你们带我出来，还不给我饭吃？”“你还跟我犟，不做饭就洗衣服！”爸爸又命令道。兴平不敢违抗，抱了一堆脏衣服泡在桶里。

吃完饭，兴平摊开画本，准备继续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挠着头半天也没有拿定主意。突然他扭头问正在抽烟的爸爸：“不知道哥哥在家里怎样了，还是不是个偷儿？”爸爸看他一眼轻轻地说：“不知道，你想你哥哥了？”兴平点点头，他决定画他哥哥。

他的哥哥叫九凌，十四岁了，在四川老家上初中。八岁时第一次发现他有偷盗的恶习，举家震惊。

当他被邻居“押送”回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差点没气出病来，奶奶一边挥舞着棍子一边痛哭：“你爹妈都不在家，老子辛辛苦苦供你吃穿供你上学，你不学好跑去学‘三只爪’！我咋向你爹妈交代？”挨完打，三天里走路都一瘸一跛，爷爷奶奶看了偷偷抹眼泪。

痛打没能改变他，第二次又被发现了。他正在打开房门，主人回家了，主人只见到一个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背影，但是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九凌。此时正好爸爸妈妈都从外地打工回来，爸爸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惩罚的方式也很极端——八月天的太阳底下跪了一整天，不准吃饭喝水。那时他也才九岁，他在太阳底下汗如雨下，一家人在屋里，泪如雨下，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把孩子扭转成人。后面爸爸妈妈在家的日子，他显得格外乖巧，要么做些家务帮奶奶穿针、帮爷爷挂挂烟草的绳子；要么带上弟弟跟其他小伙伴漫山遍野地玩“抓特务”或者拿一个午餐肉罐头盒去野炊；让他们最开心的要数到河沟里翻石头底下的小螃蟹了。家人都暗自高兴——九凌终究还是好孩子，只要勤加管教，将来一定成材。

爸爸妈妈还是要出门打工，而且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扭转回去的九凌又被告发了。这回偷盗金额是一百多块，引起了整个村子的痛惜和防范——稍微贵重一些的物品都会仔细地藏起来，门上随时上锁。

九凌被怀疑上的时候，他正在学校旁边的小吃店买米花糖。失主追踪到学校与几名老师一起对九凌进行了审问，小孩毕竟较量不过大人，他很快交代了偷盗的经过：几天前，在失主家里玩，偶然发现抽屉里一个笔记本露出的钱角。隔了一天，他又借故去玩，在主人没有在意的时候，他偷走了那一百多块钱。

赃款已经所剩无几，口袋里只掏出二十多块，两天内花光的一百多主要用于玩具和零食。

爷爷奶奶这次是真伤透了心，不但要赔礼道歉，还卖了一头家里准备过年的猪，把钱给人家还上，更重要的是调教出这样的子孙来，让老两口觉得无地自容，整天长嘘短叹，埋怨儿子丢下这样一个“祸害”就跑了。

周末了，九凌心怀忐忑地回家。奶奶一见到他，提了扫帚就追了出来，九凌撒腿便跑，一边跑一边哀求：“奶奶，你不要追了，我再也不敢了。”奶奶也不理他，径直往前追，一边追一边骂。

九凌跑到一口池塘边站住了，回过头来哭着对气喘吁吁的奶奶说：“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反正没人管我，死了算了。”奶奶一愣，没想到这孩子会说这样的话，她赶紧把扫帚扔掉说：“九儿，快回来，奶奶不打你，只要你以后不去偷钱，奶奶就不打你。”九凌回来了，奶奶一把把他拉到怀里，祖孙俩抱头痛哭。

爷爷奶奶打电话来要爸爸妈妈把哥哥也带到湛江来上学，兴平望着爸爸问：“要把哥哥也叫过来吗？”爸爸反问他：“你想他过来吗？”兴平想了想说：“这里不好，就让哥哥在家吧，我也想在家里上学。”

■ 窃国者诸侯——《我的唐朝兄弟》印象

[任星辉](#)

当两位持刀荷弓的壮汉在开篇出现时，我以为这是部武侠片；后来他们入室抢劫，又以为是部犯罪片；到了官兵出现，也就顺理成章的以为是部警匪片了。至于中间村民们的折腾，无非是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欲将其扭送伏法的大义之举。

犯罪分子的恶，恶的那么琐碎和具体，波澜不惊；“有关部门”，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如既往地神秘；至于乡民，虽知有唐，却也憨厚的不一般。三股力量在片中汇合，从头到尾真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让人恍然觉得这不过是个闹剧。可全片



任星辉 Ren Xinghui

看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在观看时的忍俊不禁，比两位“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讲完黄段子后的技术性大笑，还要虚弱、苍白和干涸。一闪念间，终于恍然大悟：这根本就是部政治伦理片；而且，就像我们从来稀缺“美好的政治”一样，它也恰如其分的是一部惨剧，悲惨的那么不着痕迹，正如我们面对现实政治时的麻木。

尽管不少人，无论是为了赚取五毛——在唐朝应该是五文大钱吧，还是不与政治、本来就那样认为，都在苦口婆心的向小民们宣讲秩序的重要。但一个即使不说，每个人也都能眼见为实的真相是秩序的致命破坏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你我他这样的小民，而是我们想指望它来维持秩序，它也当仁不让的那个政府。在这个“朕即国家”的坦诚和狂妄淡出，连最大的专制主也要告诉他治下的人们，他的引领无非是为了芸芸众生的自由和权利，而他们今天就生活在“纵做鬼也幸福”的这个时代，恐怕连“最红最专”的应

声史家，也不好意思将秦祚之断，归咎陈胜、吴广一众人的“不听话”。

犯罪和人类一样久远。在我们能预见的未来，实在看不到可以消灭犯罪而仅留存人类的迹象。当然有过这样的系统努力，但它除了助长无知和恐惧，别无贡献。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小偷小摸，乃至杀人越货，防范和打击自不在话下，但也无需过于惊恐，只要国家权力不止失灵，就不会弄出弥天大乱来。即使国家权力不能近在眼前，也会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扭送或者私刑了结“一小撮”。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垄断暴力的机体。府军进屋，出于情形紧急，无搜查证也就罢了，但“为人民服务”而至于拖拽民女，宽衣解带，又是为了哪般，又是有谁需要？

“糖衣炮弹”的蛊惑？若说这等是败类，那后面来的伙长，再往后的队长，不追捕案犯，却和乡民为难，又是为了哪般？“拒交粮税、勾结强盗、击杀府军”的指控且当下马威，放过不表，那烧杀抢掠的作为，又和鬼子进村有何二致？



府军强暴民女、击杀村民，这才是故事的开始，和有无那两个歹人，毫无瓜葛。而最悲惨的是，这也是故事的全部：“大唐律法”对府军没用，任他作为，也没人敢对府军说三道四。当遇到歹人，即使是里正

爷三十年来所遇最甚者，甬说他入室抢劫，就是他干出再大的坏事来，村民还可以扭送，扭送不得，可以报官。“伙长没了，还有队长，队长不来，还有团长……”，任他再强悍，也在劫难逃。但千盼万盼，等来的府军，好吃好喝之外，开始劫掠时，人们又能去找谁呢？歹人过处，劫财而已，府军来了，人财两空。面对歹人，里正爷振振有词，“抢财夺物击二十杖，击杀府军，死罪。”但遇上手腕更甚的军爷们时，咱这位对“大唐律法”信口而来的“爷”，却得“忍字当头”！如果里正爷哪天实在忍不下去了，乡民们也忍无可忍了，大唐王朝的天下，又会是副什么图景呢？

所以，所谓“政治”，主要是对政府的治理问题，而由政府来治理民众，实在是其次的。烧杀抢掠的歹人们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来伸张正义的政府，比歹人们还凶残。歹人们尚可以盗亦有道，而使命在身的府军，如神附体，只问上头命令，管你青红皂白。若政治的真意被置换了，变成了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整治民众，那就“稳定压倒一切”了，“维稳”了，从此，再黑暗的政治也会再无丑闻，只有万马齐喑。这样，一切就只得听天由命了——事实上，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都处在这种自求多福的境地中。

小时候，面对父母，我们有“爷爷说”的法宝护身；上学了，面对小伙伴们的刁难，“老师说”又成了圣旨；再往后，我们搬出“大唐律法”之类，大有“万物皆备于我”之势，但问题也来了：人提倡你助人为乐，你好心好意让一个据称有病的人上车搭乘，却被“钓鱼”了，断指明志，又被人跑来呵斥“你要听话”；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去关心川震中夭折的花朵，却被告知，和你无关；人说此处昭雪，你有冤屈，跑去了，人却说你有精神病……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那分明是在对权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当权者的越界和恣肆引发的一幕幕窃国惨剧。只是，兴，流的是草民的汗，亡，流的是百姓的血。

小布什有段广为流传的演讲词：“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权力才不会乱用，才不会害人。 比如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有时候想想，真是情愿不要“国家的主人”之类的封号，不求“站起来了”之类的激昂，只求能喊一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让你知道自己的界限，也能拿出你制定的律法，然后你不得不恪守自己的本分。

传知行推荐

新闻

- [陕西汉中一所民营幼儿园发生恶性案件](#)（来源：腾讯网）
- [福州出租车司机不满过严执法集体罢运](#)（来源：中国日报）
- [国务院调整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来源：中国新闻网）
- [物业税方案或已通过部委审批](#)（来源：网易财经）
- [中央 35 部门公开预算](#)（来源：中国经济网）
- [中国心脏支架滥用严重，可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来源：新华日报）
- [公立医院改革：补偿机制和人事制度是关键](#)（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 [我国不再明确禁止外国艾滋病入境](#)（来源：成都商报）
- [物业税传言再次落空 房产税或先行](#)（来源：华夏时报）
- [地方举债融资欠债超 7 万亿 评估难将致财政危机](#)（来源：南方日报）

好书

- [《烛烬梦犹虚》](#)（作者：林牧）
-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作者：塞缪尔·鲍尔斯）
- [《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作者：赵冈）
- [《资本的秘密》](#)（作者：德·索托）
- [《文明的进程》](#)（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

博客

- [《郭宇宽博客》](#)（把讲道理进行到底）
- [《连岳博客》](#)（PX 英雄的柔与韧）
- [《罗永浩博客》](#)（北京“开关厂”的烦恼）
- [《长平博客》](#)（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 [《吴稼祥博客》](#)（水手走出中南海）

文章

- [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作者：朱厚泽）
- [朱厚泽与意识形态领域“小阳春”](#)（作者：杨锦麟）
- [“三宽中宣部长”朱厚泽辞世](#)（作者：徐庆全）
- [谭作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二审辩护词](#)（作者：浦志强、夏霖）
- [没有真实，何以纪念](#)（作者：冉云飞）
- [校园幼儿园血案的背后](#)（作者：张鸣）
- [一起沉入地狱](#)（作者：殷德义）
- [医改为什么这样难？](#)（作者：杨孚瑞）
- [谁还中国豆农一个公道](#)（作者：吴敖琪）
- [看病托关系，能带来多少安全感](#)（作者：屈英和）
- [医改如何将医保做强](#)（作者：陈皮）
- [搬开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的绊脚石](#)（作者：奇然）
- [谁将公立医院推上了两难境地](#)（作者：林春霞）
- [零碎而冲突的数据](#)（作者：汤耀国）
- [西南大旱与三峡大坝](#)（作者：时寒冰）

【关于传知行】

ABOUT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立于 2007 年 3 月，英文名称为 The Transition Institute（简称为 TI）。我们致力于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等，并通过各种渠道推广给大众人群。其他出版物可从我们的网站上获取。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83-034 信箱 / 邮编：100083 / 电话：010-62618102 /

传真：010-62618102 / 联系邮箱：chuanzhixing@gmail.com /

网址：www.zhuanxing.org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 23 号楼 401-403/